

記 憶

REMEMBRANCE

2008年10月30日

第六期

2008年9月13日创刊

汇聚研究成果 提供学术资讯 建立交流平台 推动文革研究

本期目录

国史笔谈

丁 东 质疑成说，可圈可点——读史云、李丹慧新著《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

余汝信 新瓶里的旧酒——新书《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的旧思维

毛泽东研究

冷 卫 中国特色的毛泽东——从特里尔等学者之失谈起

华国锋研究

陈益南 华国锋“忠厚老实”吗？

蓦然回首

李汝高 一个“从宽”典型的悲剧

昨日心迹

陈懋智 重庆武斗见闻日记（四）

文摘

李 辉 初澜批“黑画”文章何以“夭折”

叶维丽 有笔债……

小资料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常委名单

简讯

舒 云 邱会作将军铜像在家乡揭幕

樵 余 陈英茨遗著《陈永贵本事》正式出版

宗 迅 李振盛的文革纪实影展在西班牙展出

编读往来

1、荷兰庄菁瑞对王里《文革历史研究存在误区》的意见及其他

2、高文谦致本刊信——对王老（年一）一个迟到的回应

【国史笔谈】

按：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邀请国内从事中共党史和国史研究的专家学者，历时七年，撰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十卷。据出版方介绍，此国史“各卷内容均突破意识形态的限制，建基于档案、文献、回忆录和口述史料，以至新公开资料、学术界最新研究成果，务求还原历史本来面貌。以 1949 至 1981 年中国大陆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为主线，既有对高层决策和斗争的揭示，又有表现芸芸众生的喜怒哀乐、社会风貌和流行思潮的生动画面。”在此十卷中，文革时期分为三卷。即第六卷，卜伟华著《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1966—1968），第七卷，高华著《新秩序和新冲突——从中共九大到林彪事件》（1969—1971）。第八卷，史云、李丹慧著《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为推介这一重大学术成果，本刊特设此专栏，从本期开始陆续发表国内外专家学者对第八卷的评论。

质疑成说 可圈可点

——读史云、李丹慧新著《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

丁 东

香港中文大学历时七年，组织了一套十卷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目前已经出版六卷。我读过其中的几卷之后，对史云、李丹慧所著的第八卷《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兴趣最大。本文略谈一些初步的感受。

《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叙述的是1972年到1976年中国大陆的历史。这几年，中国政层可谓波诡云谲、扑朔迷离。当时毛泽东已经处于人生的暮年，虽然大权在握，一言九鼎，但重病缠身，深居简出，甚至视力和语言表达也发生了障碍。他最大的焦虑就是选择接班人。在这四年间，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领导人先后更换了周恩来、王洪文、邓小平、华国锋四位。先后有可能进入毛泽东接班人选择视野的还有江青、张春桥、纪登奎、李德生等人。在他和其他领导人之间沟通信息的有张玉凤、毛远新、王海容、唐闻生等人。此前出版的各种著作，对毛泽东选择接班人有各种不同的说法。官方的史著，往往谁在台上就突出宣传谁的合法性。华国锋当政，强调毛对华的信任。邓小平当政，又强调毛对邓的赏识。民间的史著曾有相反的观点，比如辛子陵认为毛的本意是传位于江青。由于官方档案解密程度太低，有些关键细节甚至没有留下文字档案，又由于网上、海外媒体上流传的某些文字貌似史料，实为小说家言，造成众说纷纭、真伪难辨、鱼目混珠的局面。

此书用相当大的篇幅叙述和考辨了毛泽东晚年选择接班人的相关问题，对周恩来、邓小平、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华国锋都有分析。对周，毛是既不满意，又不能不用。周死在毛之前，不成为问题。王洪文是“刘盆子”式的人物，毛曾经寄予厚望，试了试，扶不起来，毛放弃了。毛泽东不怀疑邓小平的能力，1975年的一段时间让他主持工作。他不肯出面操作肯定文革的历史决议，终于让毛失望。毛自认为一生办了两件大事，文革是其中之一。否定了文革，就否定了自己的一半。毛看出邓对文革有否定之意，临终前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让邓再次下台。毛泽东是否有意让江青接班，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看到肯定者的证据有哪一件令人信服。江青积怨甚多，高层人际关系太差，毛是十分清楚的。毛对她是恨铁不成钢。此书认为，“从巩固文化大革命成果的角度看，毛泽东最合适的接班人是张春桥。”（184页）类似的观点高文谦曾经表达过。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思想的忠实传人的确是张春桥。书中颇有新意的一点，就是以相当篇幅，客观地说明张春桥虽然在历史上有问题，但不是叛徒和国民党特务，而

且这些问题在文革前已经交代，并有组织结论。以今天的眼光看，作为十五岁的中学生，张春桥短暂地参加“华蒂社”，知其有复兴社的背景又退出，确实不能算国民党特务。在上海，被与中央失去联系的中共上海预备党员委员会吸收为党员，更不能说明张春桥当时不想革命。林彪、康生、周恩来先后以张春桥的历史问题，阻止毛对张的信用，都是出于政治需要，而且也取得了成功——毛泽东最终没有把最高权力交给张春桥，但毛对张春桥一直怀有好感，并欣赏他的才干。此书提到，据张玉凤回忆：1976年“一月中旬，毛远新来见主席，他问主席，对总理的人选还有什么考虑？主席想了一下说：“要告诉王洪文、张春桥让一下。然后，主席就又扳着手指数政治局委员的名字，最后说，还是华国锋比较好些。毛远新点头说是。就这样，主席提议华任代总理，主持政治局工作。毛远新出来对我说：幸亏他先去了（指周总理去世），主席自己把接班人选好了。这是大事。”（610页，作者引自张玉凤《回忆毛主席去世前的一些情况》）。此书还提到：“天安门事件他（毛）坐卧不安，不断叫毛远新问情况。毛远新问他叫谁接班，他的意见是张春桥。毛远新说，张春桥太阴，不孚众望。毛泽东问毛远新的意见，毛远新说让华国锋接班比张春桥好。直到文革后毛远新在被关押中，还在表功，说华国锋当主席是他推荐的。”（658页）这个细节虽然新颖，但近日有熟人与毛远新核实，结论是并不准确。毛远新说自己对华国锋不了解，否认自己当时曾经向毛泽东推荐华国锋为接班人。好在此书叙述这件事时的口气是“有人说”，并没有把这件事当作定论，而是当作一个有待考证的线索。我认为，在坚持文革路线上，毛泽东知道只有江青、张春桥才是死心塌地的自己人。但又担心让树敌过多的张春桥主持中央工作，就可能打破中央政治局当时已经十分脆弱的平衡格局，使十分紧张的政治格局变得更加紧张。于是只好选择一个既能在中央政治局为较多人接受，又能肯定文革的人来接班，华国锋就是这样被选中了。

当时的中央政治局主要由三派组成。第一派王、张、江、姚，是文革的急先锋。第二派是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这些老人，文革中受过不同程度的冲击，对文革有抵触。第三派是华国锋、汪东兴、陈锡联、吴德、纪登奎这些人，他们没有参与文革的发动，但在文革中得到了提升。毛的如意算盘是让第一、三两派团结起来，共同掌权，巩固文革成果。书中提到“毛泽东感到在自己还能说话和头脑清醒时，需要有个交代。他两次交代当时在他身边值班的人华、王、张、汪

和毛远新五个人要团结。”（P 663）他在六月中旬还把以上五人和江青、姚文元、王海容叫到床前谈发动文化大革命“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和平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660 页）毛泽东什么都想到了，就是没有想到在他去世后不到一个月，就由华国锋主导，第二、三两派联手行动，把第一派抓起来。而第二派又在数年之后，把第三派挤出政治舞台，否定了文革。

在粉碎四人帮的问题上，叶剑英的态度很容易理解。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实际上也是批叶。汪东兴的态度也很容易理解，1970 年的庐山会议，汪东兴已经跟着林彪向张春桥发难，为此做了检讨，后来由毛保他过了关。华国锋为什么要采用非常手段抓“四人帮”？最近熊蕾的文章提到叶剑英的侄子叶选基说，“叶帅认为，这个事情只有华国锋能这么干。周总理如果在世，干不出来，小平也干不出来。叶帅也没有想到有这么一下，也不敢想。”我想，这和江青在政治舞台上活动十年的所作所为有直接关系。江青依仗毛泽东夫人的特殊地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想整谁就整谁，谁和她共事都没有安全感。她喜怒无常，盛气凌人，华国锋实在没法和她长期共事。张春桥内心认为华国锋鹊巢鸠占，取代了自己应有的位置，也不服气。华国锋与其在会议室里和他们当面发生不愉快，惹来没完没了的麻烦，不如采取非常手段，让他们从眼前彻底消失。他越是在资历和声望上不如周恩来和邓小平，越需要冒险采取非常手段。本书对这种非常手段的评价很有意思：“武力解决‘四人帮’的做法，在党内虽然不合程序，但文革中党内程序已经荡然无存。打倒刘少奇、邓小平、陶铸、贺龙、林彪等，没有一个是召开正式会议决定的。正所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694 页）

对于粉碎“四人帮”过程中各个领导人的作用，本书也作了认真的分析。作者认为按照重要性排队，应该是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李先念、吴德。（675 页）就是说，华在叶前，汪在李前。对当时其他政治局成员的态度，也一一加以评析。上世纪八十年代，华国锋、汪东兴、吴德在政坛上失势，国内对于这段历史的评说相当走形。因为抓“四人帮”是功劳，所以只讲叶剑英、李先念的作用，而淡化华国锋和汪东兴的作用，吴德的作用几乎无人提及。只是在他去世后出版了口述回忆，细节才浮出水面。

武力解决“四人帮”迄今已经 22 年，双方的当事人华国锋、叶剑英和王、

张、江、姚均已作古。在世的只有汪东兴了。从中央文件到一般的史著都说，是华、叶、汪抢在前面，粉碎了“四人帮”的武装政变计划。但此书却用一节的篇幅，梳理了已经公诸于世的相关史料，考证出这样的结论：“‘四人帮’在毛去世后这段时间里，并没有制定什么政变计划，也没有做什么发动政变的准备，更没有确定叶剑英所说的10月10日政变时间。他们当然有夺权的野心，但说想完全取代华国锋，尚为时过早。他们的活动，主要是给华和中央施加压力，维护和扩大他们自己的权力、地位。”（694页）我认为此书的观点是有说服力的。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宣传“四人帮”有政变计划，是为了占领舆论制高点，增强武力解决“四人帮”的政治合法性。政治斗争的需要和史学研究的宗旨毕竟是两码事。时过境迁，现在是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的时候了。

治史有不同的宗旨。有的追求集大成，有的追求填补空白，有的追求还原史实，有的追求反思成说，有的追求史学方法的创新。几个层面的工作都需要。大陆学者在言论和出版相对自由的香港出书，如果按照官方的历史结论框架，补充一些材料，做一些集大成的工作，其意义不可估计过高。而有意填补官方故意遮蔽的历史盲点，以扎实的考证挑战官方的不实结论者，则必须予以重视。虽然此书运用的史料、得出的结论尚有可商榷之处，但在填补空白和质疑成说方面，则可圈可点，令人刮目相看。研究中国的当代史、文革史，最需要提倡这样的胆识。

【国史笔谈】

新瓶里的旧酒

——新书《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的旧思维

余汝信

据说，余英时对不久前面世的香港中文大学编年体《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十卷本，已出六卷，尚有四卷据称即将出版），有如下评价：“这是到现在为止，一部规模最宏大、叙事最详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每卷都达到了史学著作的世界水平。作者不但一律以中俄档案、回忆录、口述历史等为基本原料，而且也大量地参考了中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不但如此，每位作者都以批判的态度检

查史料，对于史料中互相冲突的记载，详加考订，以建立最可信的史实。”（见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网页 <http://www.chineseupress.com>）笔者对余说中省略号前的小半段不表异议，却对省略号后的大半段不敢认同。

以多位学者推崇的、描述 1972 年至 1976 年的中国的第八卷《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从批林到批邓（1972——1976）》（史云、李丹慧合著，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第一版）为例（以下简称为《难》），笔者认为，虽然该卷作者对此一时期的某些个别事件有独到的见解，但全书的体例并未突破大陆官方党史教科书的窠臼，观点上往往囿于旧说而带有较多官方范式的痕迹。

例如，《难》仍存在着“文革前期沆瀣一气的林彪、江青两个野心家集团”（《难》392 页）这样旧有的提法，说明作者仍然摆脱不了“林彪、江青犯罪，毛泽东犯错”的官方说教。“林彪野心家集团”存不存在姑且勿论，历史上难道存在过一个“江青野心家集团”吗？没有！毛泽东与江青在政治上是不可分割的，要就只有“毛江集团”，断然没有一个可与毛分离的“江青集团”。

又例如，《难》称，1972 年 7 月毛泽东在他召集的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会议上批评了“四人帮”。作者虽然也承认毛的所谓批评“无论从语气还是内容，都说不上严厉”，却又称“但是，这一系列对江青的批评，毕竟是一个重要的变化。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毛对江青的一些反感甚至渐生厌恶”（《难》383 页）熟悉文革史的研究者都知道，此类“批评”与其说是批评，毋宁说是对其政治斗争手腕、策略的教诲。毛从不涉及对江青激进的极左思想体系的批评，因为从思想体系上来说毛江本来就是一家。毛晚年在生理上可能不需要江充当妻子的角色，却从未有证据表明毛在政治上厌恶他的这位学生兼战友。

再例如，《难》称，毛“他还认可了江青批判周恩来和批林批孔的做法。”（《难》383 页）作者将主次关系大大颠倒了。难道批林批孔批周的发起人不是毛泽东而是江青？该书还称，毛泽东告诫纪登奎“你那里当心，不要变成五人。”（《难》383 页）其实，“四人帮”早就是“五人帮”了。惟那另一位还轮不到纪登奎，而恰恰是毛泽东本人。毛是“五人帮”中领头的。

《难》称，“1972 年后毛泽东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情变化”（笔者注：指该

书作者自认为的“毛对江青的一些反感甚至渐生厌恶”，“只能从江青个人方面去找原因。虽然至今我们没有找到有说服力的证明，但‘红都女皇’事件也许是一个解释。”（《难》383页）

所谓“红都女皇”事件果真验证了“毛对江青的一些反感甚至渐生厌恶”吗？让我们就该书“‘红都女皇’之谜”一节，沿着《难》的作者给出的思路作些剖析，顺带的，也分析一下《难》的作者在史料运用方面的一些失误。

1、据维特克在她 1977 年出版的《江青同志》一书中说，是中国驻外机构建议她“为什么不考虑研究年轻的妇女同志，特别是那些近几年提拔到中央委员会的女同志？还问我是否介意她和高粱代表我给北京写一封信，说我请求访问中国，研究革命的女性和文化？”（《难》384页）

这段话，《难》的作者虽然有一个脚注称是引自《江青同志》英文版原著，但有理由相信是转引自笔者 2004 年的《维特克访华与〈江青同志〉》一文。原因是文中的“高粱”应为“高粱”，笔者的笔误《难》的作者原文照抄了。更应指出的是，建议维特克访华的不是一整个“中国驻外机构”，而是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黄华大使的夫人何理良。《江青同志》的原文相信更能使人明白维特克访华的来龙去脉：“我谈到江青在国外令人反感的形象使何理良引起注意并感到愤怒。她承认江青是一个有独创性的革命者，但是说我不应该老是纠缠她的过去。我为什么不考虑研究年轻的妇女同志，特别是那些近几年提拔到中央委员会的女同志？还问我是否介意她和高粱（笔者注：应为高粱）代表我给北京写一封信，说我请求访问中国，研究革命的女性和文化？她还说只有我亲眼到这个国家看看，同人民群众直接对话，才能避免以国外图书馆里一些错误的，或是不令人满意的文献为基础进行‘学术性’写作的缺陷。”（见拙稿《维特克访华与〈江青同志〉》，首发于电子杂志《枫华园》2004年4月30日总第448期）

2、在北京，维特克顺利地采访到了邓颖超、康克清等人。对外友协将报告呈送到周恩来那里。周恩来 8 月 10 日批示：“江青同志，如你这两天精神好，可以见见此人，谈上一个钟头就可以了。如不愿见，也可不见。”

(《难》384页)

对外友协什么报告？《难》的作者缺乏交待。实情是，对外友协陪同人员在一份简报中反映了维特克一再表示希望见江青的要求，周恩来办公室人员看后嘱外交部通知对外友协正式写一报告。周于8月10日将报告批给江青：“江青同志，如你这两天精神好，可以见此人，谈上一个钟头就可以了……如不愿见，也可不见。”周还批道：“在你尚在北戴河时，已请邓颖超、康克清两同志见她，谈谈长征。蔡大姐因身体不好，尚在北戴河，不拟见了。”（见丁雪松口述、杨德华整理《丁雪松回忆录》，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一版。本文引自该书电子版<http://www.shuku.net/novels/zhuanji/nds/nds.html>）

在周恩来将报告批给江青之前，刚从北戴河回京的江青根本不知道有维特克此人。报告一批，周恩来完成了江青与维特克之间牵线人的角色。周的这一举动完全是向江示好的表现，这一动作更说明，在1972年，周与江的关系是密切、良好的。

3、8月12日下午，江青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接受了维特克的采访。陪同江青的还有姚文元、外交部副部长王海容、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张颖女士等人。（《难》384页）

虽然维特克和张颖在其回忆中均称王海容在场（张颖《风雨往事——维特克采访江青实录》，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10月第一版20页），但据更权威的会见当日的新华社电讯，参加会见的是两位中央政治局委员江青、姚文元，对外友协秘书长丁雪松，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张颖，以及单达圻、陈明仙、沈若芸、徐尔维和于世莲，并没有提及王海容（新华社1972年8月12日讯；《人民日报》1972年8月13日第二版）。《人民日报》以及《江青同志》英文版原著所附的会见照片中也没有王海容。此外，王、张两人的职务在《难》的叙述中也有误，王当时是外交部部长助理，张如前所述为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

4、江青十分兴奋地说了很多关于自己个人历史的内容，表现出希望维特克为她写传的强烈欲望：

关于我个人的历史，我的革命斗争史，我都可以对你谈。唔，还有不

少罗曼蒂克的意思呢。

我们合作吧，我提供你材料，我给你说，你来写，我想你一定知道，美国以前有一位著名作家埃德加·斯诺，他在 30 年代写过毛泽东，写中国共产党，在西方一举成名。你很年轻，很有才华。你写我，写现代的中国，那就是第二个斯诺，你将举世闻名。(《难》384 页)

后两段话，《难》一书引自张颖的“实录”。(张颖《风雨往事——维特克采访江青实录》22—24 页)问题是张颖称当年“所有记录稿全部清理封存，一份归入档案。”(同上书 163 页)“江青把封存在外交部的所有记录材料都搬走，而且烧毁了。”(同上书 167 页)那末，二十多年后“实录”中这些谈话“记录”又从何而来？凭过人的记忆还是凭想象？

反之，今天我们已可阅读到维特克的英文原著(她有中方给她的前半部分谈话记录和她自己全部的英文速记稿)和中译本(罗克珊·维特克著、范思译《红都女皇——江青同志》，香港星克尔出版有限公司 2006 年第一版)，为什么还要引用张颖这些不可靠的、带有强烈倾向性的材料？

张颖的不可靠在于，其一，江青要塑造的，是一个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形象，这一形象身上怎么允许带有小资产阶级的罗曼蒂克成份？

其二，根据维特克的版本，有关斯诺及其夫人一段是，江青“她转到另外一个话题，她说周总理关心的问题之一是建议她应该接见哪些外国客人。当埃德加·斯诺的夫人洛伊斯·惠勒·斯诺 1970 年 9 月来北京访问的时候，只有很短的时间来安排接待工作。通知江青参加接待的时候，她正在小睡。因为没有任何提前的通知，她一时不知道应该送给尊贵的客人一份什么样的合适礼物。而在斯诺夫人这一边，她也被弄得有些混乱，结果意外地把本来准备送给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的礼物送给了江青。

“‘你见过斯诺夫妇吗？’她问道。

“虽然曾经读过很多斯诺写的书和文章，我没有见过他们，对于他的作品我们只聊了几句。然而，我和他的前妻奈·威尔士有联系，她曾经在 1930 年代末

期采访过中国的女性革命领导人。

“‘他现在的妻子对中国也非常友好。如果你见到她，请转达我对她和她的家人的问候以及欢迎她再次来访。你成为中国的朋友后，你也可以经常来看看我们。只要我还活着，我一定接待你。’”（《维特克访华与〈江青同志〉》）

这里，没有什么“一举成名”、“第二个斯诺”、“你将举世闻名”等等。维特克记录的，是当时处处显示自己革命化的江青，而张颖笔下的，是被脸谱化的江青。

5、维特克受宠若惊，立即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江青还宴请维氏并到北京护国寺人民剧场观看样板戏《红灯记》。当天一直谈到晚上 11 时。江青还与维特克约定，在广州继续进行采访。（《难》384 页）

据维特克的版本，看戏的地方是在天桥剧场，不过这无关宏旨，重要的是，江青当晚与维特克约定在“广州继续进行采访”却是《难》的作者自己的创作。维特克是 8 月 24 日在上海采访期间才突然被告之江青要再见她的。8 月 12 日晚告别时，江青只是告知维特克，此次会见的谈话她可以发表，不过“首先我必须请总理查看我们会晤的记录。”对于维特克问江是否会再讲解诸如她生活的其他方面的试探，江最后说，“这次没时间了。下次你到中国来，我们再谈。这会儿，我要给你一些纪念品，尽管我是一个摄影门外汉，我还是拍了一些照片，我要给你一些当作纪念。也许这是班门弄斧。我这会儿没带好的，我拍了一些女民兵，但‘有些人’拿走了好的。等回到中南海，我再找一找。”（罗克珊·维特克著、范思译《红都女皇——江青同志》34—35 页）

6、陪同江青接待采访的张颖等人认为江青所谈内容严重出格，时间也过长，向外交部领导做了汇报，部领导无可奈何。周恩来也十分伤脑筋，连续三次召集陪同接待维特克人员开会，商议对策。针对江青要谈解放战争历史的打算，周恩来对张颖说：“不要谈什么战争。你到广州以后把我的意见立即转告江青同志，只谈文艺。再见一次就够了。”（《难》385 页）

这又是《难》的作者不加分析地采用了张颖的说法。试问在当时的政治氛围

之下，一位副司长级的陪同人员怎么可能向部一级领导反映一位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谈话“严重出格”？相反，以维特克当时的观察，张在江身边是另外一副模样，“张颖只比江青小 8 岁，但像大多数人一样，政治地位要低得多。在江青面前，她是个敏锐的观察者，说话总是很谨慎，……江青通过张颖这个渠道传达给我信息，她喜欢通过他们间接传达。这样，我就不会打断她的思路。张颖也传递能让我看的文件，都是有关江青后来的经历”。（罗克珊·维特克著、范思译《红都女皇——江青同志》150 页）

张颖当时与江青的关系，1976 年 10 月以后曾受到抨击，对外友协的一份报告将其划入与江青合谋分子一边。（张颖《风雨往事——维特克采访江青实录》169 页）这大概可以解释为什么张颖在 25 年之后要拼命洗脱自己与江青的一切干系。

至于张颖所称周恩来对江青谈话的范围、时间限制，事实上维特克 8 月 12 日与江青见面之后，又与“邓颖超和其他妇女领导干部”讨论了四个上午。（罗克珊·维特克著、范思译《红都女皇——江青同志》35 页）为什么周恩来对自己的妻子可以不加限制而对江青则限制“只谈文艺”而且“再见一次就够了”？张颖这些说法可信吗？

7、在总计长达六十多小时的六次采访中，江青几乎毫无保留地向维特克讲述了自己的历史，吹嘘自己在陕北和毛泽东一起指挥解放战争，并且把抗美援朝战争等军事地图和中央有关部门的内部文件提供给维特克使用，要翻译和接待人员把全部录音整理成文字送给维特克写传用。（《难》385 页）

实事求是地说，江青只是说自己在陕北作为妻子与丈夫一起转移，并没有“吹嘘”自己和毛“一起指挥解放战争”，转移行动与指挥作战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江青向维特克提供的地图，只是 25 年前在陕北的“毛泽东主席行动路线图”，并没有什么“抗美援朝战争等军事地图”。所谓“中央有关部门的内部文件”，只是诸如江青召集的 1966 年 2 月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等，类似“文件”，早

已于 1967 年间在报刊上公开披露过。

8、说到在上海的生活，江青还细声细气地哼起了上海小调：“我呀我的妹妹哩，舍呀舍不得离……哟呵呀呵唉……哈哈，哈哈。”江青娇笑着说：“有意思，是不是？”

我一到上海呀，男朋友可多了。喏，就是追逐我的人，我都可以数出名字来，他们还使用各种手段哩。以后都成了知名人士，现在又被打倒了。哈哈，还是不说他们吧。有趣的一次，是你们美国人，是一个水兵，也许是喝醉酒了，摇摇摆摆在上海外滩走着，向我迎面走来，他站在我面前，挡住我的路，向我敬了一个军礼：两脚一并，咔嚓一声。我回头想走开，那家伙嬉皮笑脸向我走近来，双手也伸过来了，哼，想占便宜！我抬手就给他一巴掌。他还是笑嘻嘻，又是咔嚓一声，敬了个军礼，还说对不起呢。你们美国人，还是懂礼貌的……（《难》386 页）

《难》转引自张颖“实录”的以上一段，已经远不是什么“实录”，而是对历史的演义了。问题是作为严肃的历史著作，为什么会引用这么一些一般研究者都不屑一顾的演义式、脸谱化的材料呢？

根据维特克的说法，江青在回忆上海时期的经历时，完全没有这么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江青对在上海岁月的回忆，揭示了外国人与中国人、穷人与富人、反动分子与激进分子、投降派与爱国者之间的对立，即财富和权力不平等的极端对立。对于像她这样的被压迫者来说，生活是痛苦的”。（罗克珊·维特克著 范思译《红都女皇——江青同志》93 页）

不要忘记，江青当时极力要维护的，是一副彻底的革命者的形象。维特克说：“1930 年代的上海艺术团体盛行，江青宣称加入了左翼联盟。左翼联盟的作用包括保护艺术家免受国民党对异端书籍的粗暴审查、对先锋艺术的破坏、对革新电影的镇压、对自由教育的限制”。“在 1935 年农历新年被释放后，江青很快恢复了演艺生涯。她说，有生以来第一次受到真正的喝彩。几个左翼团体都秘密

派人与她接头，建立关系。尽管她尚未成为办过正式手续的有充分资格的共产党员，但左翼团体承认她是一个革命者。……他们一定已经认识到，不论她曾经参加的戏剧、电影和其他活动看起来是多少平淡无味，但在本质上都是革命的”。

（罗克珊·维特克著 范思译《红都女皇——江青同志》98页）

9、此事到此已经基本结束。然而，1973年香港有人写了一本《〈红都女皇〉以吹捧形式影射江青。流入大陆后，社会上传说就是维特克利用采访写的，引起轩然大波。……

王年一文章认为，《红都女皇》这本书出版和林彪军人集团有极大的关系。

1969年5月17日，江青把黄、吴、李、邱和姚文元、李德生找来，谈了一个上午，攻击周恩来，大吹毛泽东在延安如何追求她。……黄、吴、李、邱听后十分反感，回来报告林彪，林要他们立即报告毛泽东。但毛听后并无反应，却要他们保密。随后黄、吴、李、邱又报告了周恩来。

王年一文章认为，这是第一次涉及毛泽东婚姻家庭这个敏感问题，而且又是江青与维特克谈话之前的惟一一次泄露。这次泄露得知内情的只有林彪和周恩来。周绝对不会借此向江青发难，这不符合周恩来一生的政治风格。因而，结论应是，黄、吴、李、邱遭拘捕后，军队有知情人将江青的历史泄露出去，进行报复。（《难》387页）

“王年一的文章”，指署名王年一、吴润生的《江青的一次讲话与〈红都女皇〉》，原载《文史精华》2002年第3期，《难》引用的是《老年教育》2002年第7期转载并改了标题的《〈红都女皇〉究竟泄了什么密》。这是以王年一名义合写的文章中最糟糕的一篇，据笔者了解，此文真正的作者并非王而是吴。

《难》和王、吴文都肯定了1973年（《难》的说法）或1975年（王、吴文说法）香港有人（王、吴文指称是女作家）写了一本《红都女皇》。而据笔者

多年的考查，《红都女皇》一书只是一种传闻，没有人能说出这本书的作者、出版者，没有人能讲清它对江青究竟是褒还是贬，查遍香港大小公共图书馆、大学图书馆，也没有这本书的踪影。

王、吴文称，《红都女皇》是“第一次”涉及毛泽东婚姻家庭这个敏感问题。错！斯诺前妻海伦·斯诺（尼姆·韦尔斯）1930年代出版的《红色中国内幕》（《续西行漫记》）早已涉及此一题目。文革期间在香港出版的丁望著《江青简传》（香港：当代中国研究所1967年9月第一版）、钟华敏著《江青正传》（香港：友联研究所1967年11月初版），都涉及毛的几次婚姻经过（如《江青正传》涉及毛、江之恋的有西北行，往延安，“鲁艺”教话剧，徐、蓝之恋，初见毛泽东，窑洞藏娇，飞上枝头，未见凤凰等章节）。

1974年10月，台湾出版了一本《江青外传》（老龙著，台北：金兰文化出版社，民国六十三年十月初版），这是与《红都女皇》传闻最接近的一本书。全书为章回演义体，涉及毛、江延安时期婚姻关系的共五回，即“一四、红罗帐里假戏真做，到处碰壁逼上延安；一五、窑洞里怪人故事多，礼拜六四郎探母了；一六、茫茫前路求救康生，鲁艺鬼混徐蓝热恋；一七、康生定计铺杏花路，飞上枝头想作凤凰；一八、暗里偷欢身怀孽种，改名易姓正式同居”。该书为海外文人搜集资料所作（这些资料自1930年代起在国统区及海外就很多），与大陆境内任何人及维特克都毫无干系。

《红都女皇》本身已属传闻，王、吴文却认定传闻中的这本书与“林彪军人集团”（王、吴原文是“林彪的‘军中派’”）“有极大的关系”，更是一种毫无事实依据的主观臆度。既然毛的婚姻问题自1930年代起已广泛传播于海外（只是建国后铁幕里的大陆百姓被蒙在鼓里），即使有如《江青外传》这样的一本《红都女皇》，与四五年前江青一次极小范围内的谈话及已失势的“林彪的‘军中派’”又有何相干？（王、吴的原文更主观臆断“倒台后的他们还会通过亲朋好友向香港有关人士透露江青1969年5月17日讲话的内容，指使人写这本《红都女皇》”）黄吴李邱已被隔离关押多年，他们子女的政治待遇连普通百姓都不如，又有什么能量、有什么必要指使人写这本《红都女皇》？（何况据《难》说这本书还是吹捧江青的！）这样的主观臆断与科学的历史研究相距何止十万八千里！

10、《红都女皇》事件当时在社会上不胫而走，沸沸扬扬，但中央是

否有处理，始终是个谜。

研究“文革”的权威专家，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教授范硕少将在他的著作《叶剑英在非常时期》中记载说：后来中央决定，让一位外交人员不惜用巨金买下版权，把这本书送回国内。毛泽东看了后非常气愤，挥笔写道：“孤陋寡闻，愚昧无知。立即撵出政治局，分道扬镳。”范书还说，周恩来看到毛泽东不过是在气头上，并没有下定处理江青的决心，只好“暂缓执行”。这一批示后来被其他一些著作转引，范氏坚持自己曾经看到过毛的批示。但是《周恩来年谱》等书中并无只字。（《难》387—388页）

既然《红都女皇》只是一个传闻，“中央”如何处理？惟自此《难》作者的思维却游走在“有处理”与“无处理”之间，最后的结论竟然是“有处理”！

《难》引述的范硕一书就是“有处理”的典型。

范说的不惜用巨金买下的是哪一本书的版权？《红都女皇》的版权吗？这本书根本就是子虚乌有，向谁买版权？《江青同志》的版权吗？《江青同志》已经出版，还买什么版权？且《江青同志》1977年出版之时，毛泽东已于前一年去世，如何会“看了非常气愤”，还“挥笔”写下一段批江文字？可见，“非常气愤”与那批江的一段话，都是毛发动“批林批孔批周公”后受压抑已久的老百姓编派出来的“政治谣言”，愿望是良好的，事实是不存在的。

有关《江青同志》的版权问题，笔者在2004年的文章里引述过维特克本人的说法，这里不妨重抄一遍：“这些不可预料的内幕更加坚定了我要采用江青提供的大量口述材料的决心。这本书的准备工作并没有对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保密，而且他们显然从北京知道了一些我和江青谈话的主要内容，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对此的焦虑也与日剧增。终于，1974年1月，何理良（她那时刚在北京呆了三个月）再次敦促我不要出版一本完全是传记形式的书，或我喜欢的称呼‘江青同志眼中的革命史’。她问我是否还记得‘五月公告’（1973年5月她和黄华警告我不要写传记），同时提出只要我答应他们的要求可以给我金钱奖励。我自自然是拒绝了。出于对江青本来的愿望和对历史的尊重，我认为这些独特的记录不应该被埋藏起来，所以我继续准备我的出版计划。”（《维特克访华与〈江青同志〉》）

11、这时候，张去看望叶剑英，叶突然转变话题问：“江青和维特克那次事情怎样结束的？”张告诉他江青把外交部封存的所有记录材料都搬走了，而且烧毁了。叶只自语说：“这事有蹊跷。”由此看来，这时在中央还没有就江青见维特克一事做出正式处理，至少在政治局范围内没有，因为连叶也不知道详情。据笔者所知，许多当时的政治局委员“文革”后也表示不知道毛泽东对此事有否批示。（《难》388页）

以上一段，《难》作者的钟摆摆到了“无处理”处。但很快，在下一段又摆回了“有处理”处。

12、但是，也有些记载认为当时中央确实有强烈反应。朱德的孙子在回忆录中说：

有一天，爷爷的秘书送来一封给爷爷的信，打开一看，是反映江青问题的。江青在1972年8月下旬曾经接见过一位美国女学者维特克，谈了一个星期，吹嘘自己，于是，就有了根据维特克这次采访出版的书《红都女皇》，在世界上影响很不好。

爷爷看了信，感到问题性质严重，江青胡乱说话，影响竟然跑到国外去了。因为她是主席夫人，颐指气使，谁也不敢惹她，所以才把问题反映到这里来。爷爷觉得不能把问题压下来，就划了圈，写了：此事重大，须慎重处理，并报送主席。

据说，毛泽东看了《红都女皇》，气愤难抑，写了对江青的批示“分道扬镳，撵出政治局……”

此说虽然把《红都女皇》与维特克采访混为一谈，但确也说明了中央领导人中当时有人反映此事。购买维特克版权一事，也有雪泥鸿爪可寻。

（《难》388-389页）

朱德孙子的这段回忆，明显是事后编造的“伪回忆”。其一，迄今为止没有实物证明曾经有过《红都女皇》这本书；其二，正如《难》的作者自己所说，将传闻中的《红都女皇》与维特克采访混为一谈；其三，既然无法证明有《红都女皇》一书，维特克的《江青同志》出版时毛又已经逝世，何以能“气愤难抑”；其四，毛、江思想体系是一致的，可能以毛的标准来衡量，江青的谈话并无大碍，又何来“气愤难抑”？其五，朱德在整个文革期间都只是一个摆设，未有任何政治上的影响力和实质性的权力，谁会向他反映江青的“问题”？退一步说，如确有反映，朱德有能力处理吗？他敢向毛“报送”吗？他敢惹江青吗？

《难》的作者以朱德孙子这种“伪回忆”企图“确也说明中央领导人当时有人反映此事。购买维特克版权一事，也有雪泥鸿爪可寻”，只能说明作者对史料的判断力出了大问题。

13、粉碎“四人帮”一周后的 1976 年 10 月 12 日，华国锋、叶剑英等接见上海马天水等人时，华国锋在讲话中历数江青罪状曾说：

江青和美国女作家维特克谈话，谈了六次，贬低主席，内容下流。“四人帮”逼着外交部交出，特别是王洪文主持工作，他亲自写信，找乔冠华把材料要回来。后来中央决定，我们说花多少钱也要把这本书的版权买回来。（《难》389 页）

华国锋这段话政治色彩甚浓以致罔顾事实。客观地说，维特克是周恩来引见给江青的，不管江青与其谈了多少次，都不能算是“罪状”。江青的谈话并没有贬低毛，也并无什么下流之处（充其量只是“左”得惊人）。所谓“后来中央决定，我们说花多少钱也要把这本书的版权买回来”，看来也没有付诸实行。《江青同志》的版权（包括中、英文版权）至今一直在维特克手上。《江青同志》近年在香港出过中文版，也不见得有什么中方机构进行过干预（相反维特克曾过问了一下）。

14、综上所述，我们虽然不能完全解开《红都女皇》之谜，但也可以得出一个基本分析：1972 年江青在接受维特克采访时说了很多极不得体的话，特别是有关毛泽东在延安的私生活，影响很坏。但当时因为记录稿

没有传出去，并没有立即产生风波。而 1973 年以后香港《红都女皇》的出版，成为导火索，中央有人联系起来向毛反映。可能在很小的范围，比如、毛、周、江之间，有过内部处理。

至于毛的那段“立即撵出政治局”批示，为什么没有在粉碎“四人帮”时作为最有力的尚方宝剑公布？仍然是个谜。（《难》390 页）

通过以上“基本分析”，《难》的作者又坐实了“可能……有过内部处理”的说法。

惟笔者认为，周恩来将维特克引见给江青，反映了“九一三事件”之后至 1972 年间毛、江、周之间紧密而良好的关系。江青会见维特克时的谈话，通篇反映了其极端革命的、极左的激进派思维，并非是得体不得体的问题。而引起最大争议的有关毛在延安时期婚姻问题一节，江的本意是驳斥外间的“胡说八道”和“恶意诽谤”，如有关贺子珍与毛的关系，江强调是贺挑起离婚而不是毛，这些都是为了维护毛，而绝非贬低毛的形象。

然而，1973 年中毛利用江等激进派发起批林批孔及至 1974 年反复辟回潮，尤其是 1973 年冬在外事领域对周恩来进行无理批评后，引致相当一部分干部群众的不解与不满。在外事系统内拖延以至中止了对维特克所需材料的提供甚至劝其不要出版江青的传记，都是这种不满的一些体现。而《红都女皇》的传闻，更是这种不满的一种发泄。所谓毛对江的批示，实质上只是不满的人们编造出来的期冀，这就从根本上解释了这一政治流言为什么不是一把《难》的作者想象中的“尚方宝剑”，因为，它仅仅只是流言而已。

15、尽管如此，可以想见，当毛看到江青的信口开河、肆无忌惮谈话记录，并联系起《红都女皇》的恶劣影响，心中肯定怒火中烧。毛泽东过去就对江青的作风和为人颇多不满，只是由于晚年发动“文革”的政治需要，才信用支持江青和容忍了她的一些做法。“文革”后期，这种需要逐渐淡化，仅仅成为维护一种形象了。因为，江青是文化革命的一个图腾，无法割裂。这也许能够成为从 1972 年以后毛泽东多次批评江青、与之疏远、但又不

能下决心予以处置的一个解释。(《难》390页)

在这里,《难》的作者再次将“可以想见”之事变成为“肯定”实在之事。其实,迄今为止,我们并无任何可靠的证据表明毛泽东是否得知江青见过维特克,更不清楚毛对此事表示过什么态度。该书作者有什么根据说“当毛看到江青……谈话记录”?既然《红都女皇》一书我们从未见过实物,如何得知它会影响“恶劣”?又怎么能推断毛“心中肯定怒火中烧”?

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毛在重大问题上从来都是依靠江青。从文革发起阶段,1965年的批《海瑞罢官》、1966年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及“五一六通知”的产生过程均可见一斑。1966年7月8日给江青的信,更说明毛对江青的信任度超越了他在党内的任何一位“朋友”(包括林彪、周恩来)。即使在文革后期,1973年的批林批孔批周公,1974年的儒法斗争讨论和反复辟回潮,1975年的评《水浒》批投降派,1976年的反击左倾翻案风,哪一桩能离得开江青?这种政治上的需要又何曾淡化过?文化大革命的图腾绝不仅仅是江青,而是毛泽东和江青!企图在毛、江之间找到政治上的嫌隙和裂缝,恐怕永远是白费力气、徒劳无益的。

2008年10月

【毛泽东研究】

中国特色的毛泽东

——从特里尔等学者之失说起

冷 卫

什么样的人马克思主义者?这个问题应该很明白。如果有一个人,终其一生都不曾下工夫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基本学说,对孕育了马克思主义的西方思想文化丝毫不感兴趣,甚至特别反感近代以来普世的价值观,以至其“事业”完全与马、恩的主张背道而驰,请问谁能说这样的人是马克思主义者?

毛泽东确曾被中国共产党尊为“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是综观他的一生,他对马克思主义是“一不热心,二不在行”。把他说成马克思主义

者，既是马克思主义的一场悲剧，也是中国的一场闹剧。

在毛泽东研究上，国外的一些学者，典型如美国的特里尔，在我看来出现了严重的失误。他们为避免“西方人士的不客观”，几乎完全接受了中国官方对毛泽东的讲述甚至词语；他们为避免犯下简单化的错误，好心地运用过量的“理想和思想”来想当然地“丰富”毛泽东，致使其严重偏离真实。这样一来，在他们笔下，毛泽东竟给描画成了“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当然，比起国内的诸多主流叙述来，特里尔等学者至少态度还是严肃的。但在偏离事实这一点上，两者却是五十步与百步，本质上差别不大。

仅举一例，在特里尔眼中，毛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为了反对苏修式的官僚主义，维护巴黎公社式的无产阶级革命原教旨主义。我认为，这是相信了不该相信的言说，必然出现的谬误。

其实文革的目的，以及毛泽东的动机并不难揭发。毛之反对“苏修”，目的仅是要和苏联争夺霸权；事实上，他在中国建立的个人独裁，要比古拉格政权更加残酷可怕。他力推法家暴政，结果是暴虐官吏横行于世，人民不敢言甚至不敢怒。文革表面上有“四大”自由，可经历过的人都明白，任何人都只能奉旨“造反”。显而易见，只要保持常识性的清醒，就不难看出东方王朝的政治传统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观念，相差何止千里。比如葛兰西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就说过“马克思主义是实践哲学”，“无产阶级要争夺文化领导权”。但若有人就此以为，毛泽东的文革与葛兰西的思想是一回事，那岂不可笑吗？事实上，毛泽东毕生都不曾重视中国以外的任何一位学者，哪怕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特里尔从没有真正理解毛著名的“马克思加秦始皇”的坦率自白，他并不了解溶化在毛血液中的传统帝王独裁观念。他用天生缺失皇权专制底色的西方文化颜料来描摹中国的当代秦始皇，从一落笔就形神尽失。而用原教旨马克思主义或是理想主义来阐释毛泽东，则无异于为历史大念野狐禅。

当然，毛泽东本人在公开场合，一向喜欢使用“主义的”叙事词语，总是高谈阔论“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标准斯大林理论，以及“反修防修”的原教旨思虑。但是，这些语言都只是他这个实用主义者惯用的障眼法，目的仅仅是为他的真实动机涂上一层因正统而眩目的装饰色，让轻信的人上当受骗，更让他的受害者陷于“反动”的待罪地位无法自辩。实际上，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还有

什么人对它的歪曲和背离能超过毛呢？

中国历来的帝王全都是实用主义者，行为基本原则仅仅是直接而明确的抓权利己。反复自比秦始皇的毛泽东，也不例外。这类人物的复杂性，可能更在于他们如何清醒地让自己的人性泯灭，可能更在于恩格斯所说的“意识到的个人意志与没有意识到的历史作用的矛盾”；但绝对不在于他们错误百出的马克思主义言说。那些言说，从来都只是浑身溅满血污的暴君们擦抹自身的一条旧手巾。

文化大革命，堪称现代中国的头等大事，尽管毛泽东的计划很复杂，但他的真实目的其实很简单。请注意他的文革干将们的大白话：江青在当年就多次作报告说，文化大革命，就是改朝换代。张春桥在对毛的两个一号文件表示深深不满时，也吟诗道：“总把新桃换旧符”。他们都是主子的心腹，所以领会得清楚，宣讲得直白。文化大革命，目的就是要彻底改组朝廷，老臣统统要滚蛋，一拨新贵要上台。在毛的中式传统思维里，接班人最好是亲生儿子，如蒋介石的蒋经国，金日成的金正日。但毛没那样的可用之儿，于是老婆侄儿就是最接近的代用品。

揆诸史实，我们也清楚地看见，毛确实是在有计划有步骤地用江青、毛远新这一类“新鲜血液”，来取代刘、林、周、邓、叶、陈、李，这批老的追随者。姚文元去世前写下回忆：毛泽东在1976年“几次说过”，他身后的权力交班，是这样安排的：党主席江青，人大委员长王洪文，总理纪登奎，军委主席陈锡联。张玉凤则回忆说：毛曾圈定毛远新当政治局委员。其实何须看谁谁的回忆录，从九大、十大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的大规模更换，以及毛远新从“儿童团”飞速窜升到“主席（与政治局的）联络员”，就已经清清楚楚了。

从林彪集团对前途的忧虑中，我们也清楚看到，林彪和黄、吴、叶、李、邱最提防的正是江青、张春桥那些新起的“文革派”。相比林彪的“丘八集团”，那些人才是毛瞩目的“新桃”，而林彪不管有多少新旧功劳，仍然被无情地划到“旧符”一类。他们注定是要清除掉的，时间早晚只取决于毛眼中的利用时限的长短。

周恩来、陈云、李先念的命运则更清楚地显示出，哪怕他们从来就不敢向毛的无法无天发出一点点非议，但在毛的战略计划中，他们仍然被划到九大的右派代表中去，也就是必须清洗的人物。

与主流看法不同，我不认为1975年毛让邓小平复出理事，是真心看重“人

才难得”。毛泽东评判人物，从来不把“人才”作为首要标准，例如他超拔王洪文、华国锋。他看重的是划线站队，是否绝对为他所用。综观毛的一生行事，他从来都如林彪总结的那样：得罪人就彻底得罪，整人就整到不得好死。让已被他打倒的邓复出的真实动机，我看只有一种考虑，就是“诱敌深入”——让邓犯更大的错误，然后再次彻底打倒、永世不得翻身。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引诱一帮龟缩起来的老家伙放肆出洞，便于一网打尽，不留后患；进而保证让“新符”们接掌大权更顺利。在打倒邓小平时机未到之前，哪怕他跟江青激烈冲突，毛也会数次做出宽宏大量的姿态，批评江青几句，甚至要江青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检讨。毛如此做秀，既是在人前显示自己大公无私，同时更是促使邓小平放松警惕，放心大胆地犯下毛要他犯的错误。毛决定打倒邓小平时还没有天安门四五事件，钦定的罪名，正是全面否定文革，大搞还乡团。

毛泽东在统治中，与其说是遵循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原则，还不如说是仰仗传统的中国帝王统治术。众所周知，毛泽东毕生最喜爱的读物是《三国演义》、《水浒传》、《资治通鉴》一类古书。如果特里尔们对这些中国古典足够熟悉的话，他们应当从宋江题写的反诗“自幼熟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当中，从曹操的名言“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当中，体味到毛泽东的政治性格和人生信条。真实的毛正如历代帝王一样，内心信服的只是“申韩之术”，即他公开提倡的法家。正是遵照“法、术、势”的帝王权术指南，他才在历史面前做了那么多不光彩的表演。而他对孕育了马克思主义的西方文明根本就不感兴趣。早在延安，他就严厉批评“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他那样爱叫嚷阶级斗争，却在批陈伯达时，把专讲阶级斗争的《法兰西内战》断言为不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竟然只是“造反有理”。

当年的博古、张闻天等人初识毛泽东，就感到“山沟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他的胞弟毛泽民也曾对他抗议说：“共产党不是你毛氏宗祠！”而毛泽东一向以“伟大光荣正确的党”自居，却也说出“我党真懂马列的人不多”这样的大实话来。过高估计马克思主义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地位，只会诱使天真的人们迷失在脱离实际的混沌里。善意地搬用西方思想体系来阐释毛这个历史人物，只会令人们南辕北辙，对反普世价值的“中国特色”丧失应有的警惕。

当然，也不能说毛泽东绝对不从国外吸取政治营养。但这种“拿来主义”的

实用态度，决定了他只会接受能够直接补充他权谋的那些具体招数，而绝不会促使他全面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等西方思想。《共产党宣言》译成中文时，毛才不过三十岁；但终其一生，有谁听说过毛赞扬这个观点——“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将是整个社会发展的前提”？对于来自西方的正面普世价值，例如民主自由，例如个人权利，毛泽东，以及在他前后许多中国特色的大小人物，都是极其仇视、坚决反对的。在认识历史的和现实的中国之时，这个要点无论如何不能忽视。

斯大林是唯一的例外，得到了毛的捍卫。田家英等毛的贴身秘书，早在 1959 年就因私下议论“斯大林晚年”而获罪。可见毛和他虽不喜欢却还要坚决捍卫的斯大林，确有共同之处。

斯大林也是他那个时代的“全俄罗斯的专制君主——沙皇”。从他掌权伊始，他就深深感到一班平起平坐的老战友总是不能让他称心如意，既要分沾革命的功劳，又要议论治国的对错，竟敢不把他当作“主人”（贝利亚等对斯大林的谏称）。他也看得很清楚：只有完全清除老家伙，自己才能独揽一切功劳和权势。最理想的是由他一手提拔新人，新人没有革命的资历，自然不可能威胁他那“伟大领袖”的绝对地位。而最重要的是，新人越是“儿童团”，就越要仰仗他的封赏，就必然把他当成“生身的父亲”，会为他去做最不可思议的肮脏勾当，还不敢有二话！因此，斯大林从 1920 年代到去世前，三十年间一直在搞“新陈代谢”。

毛初见就特别欣赏斯大林编写的《联共党史简明教程》，早在延安整风前就由衷称赞“写得真好，章章都好！”显然，斯大林把政治迫害居然美化成路线斗争、阶级斗争等等天才发明，大受毛泽东青睐，化为他大搞党内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锋利武器。无限的恐怖无疑最有利于无限的独裁。毛也像斯大林那样盘算：文化大革命要“经常搞，反复搞，过七八年再来一次”！

柳亚子曾赋诗云“斯毛并世战玄黄”；斯毛之所以能并世，只因为他们同为“东方专制主义”在 20 世纪的典型代表。

在五六十年代，毛有着比当年斯大林更严重的心结，因为他犯下了一连串比斯大林更甚的严重错误，难以遮掩，更难以推给别人。彭德怀虽然被他硬打了下去，但三年特大饥荒却无法掩饰。刘少奇竟胆敢当面警告他“人相食，你我要上史书的！”他生怕自己在现实中独裁的大权旁落，在历史上受到清算批判。环顾他的周围，党中央其他六位最高领导人当中，只有一个林彪还维护他。另外五位，

例如邓小平，开会时坐得远远的，明摆出不愿再紧跟了。极端高压之下，党内外居然还有不满他的声音，以致他惊恐地感到“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专了我们的政”。在这里，我们要切记：如果不能看穿毛的“主义”言说包装，那就不能看清毛的思想和行为。

从秦始皇到毛泽东，中国历史封闭循环了两千多年。在二十世纪，“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纵情讴歌的仍然还是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至于西方的什么主义，在毛的心目中，不过是些辞藻；或更加过分，只是一两把能用来杀仇人的“刀子”。“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那是绝对中国特色的毛泽东。

遥想当年，毛环顾四周，的确是“蜀中无大将”，除了一个江青满怀怨恨，戾气可用，还有什么人能派出去打头阵呢？我猜这位秦始皇，心下不能没有一丝“独夫”的凄凉。所以当时他爱说些“反潮流”“五不怕”之类的豪言壮语，虽说是给亲信打气用的，也不会没有一丝自况吧？以他的性格作风，一旦感觉被人嫌弃，那与所有人为仇的心气，应该是非常可怕的。所以他说：“七亿人，不斗行吗？！”狠恶之气，溢于言表。文化大革命就此被策划，被发动，被扩大，被延长，以致酿成十年浩劫。

评价文革，实际上就是评价毛泽东。邓小平、陈云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多次谈到文化大革命“倒行逆施”的反动性质；叶剑英进一步提出了“封建法西斯主义”；李维汉更是提出了“封建法西斯专政”的精辟见解，还曾获得邓小平首肯，至今还对人们有着重要的启迪作用。也许，更重要的启迪还在于：批判封建法西斯专政的众多人物，还要继续尊毛，尊孔，尊崇中国特色。这个现实对于中国向何处去具有什么意义呢？西方的学术精英如特里尔等，又当如何看待这样的现实呢？

毛泽东已成往事，可是孕育他养成他的“中国特色”一如既往，仍然强大地存在着。在其强大影响之下，即使在今天，尊孔读经的鼓噪和对帝王将相的膜拜，不也绝对压倒了对德先生和赛先生等人类普世价值的百年呼唤吗？当年卢卡奇有言：德国迟迟不能走上正确的发展道路，以至遭到纳粹巨痛，是因为德国人民在历史的岔路口总是做出错误的选择，拒绝普世价值。

但愿我们能稍微明智一点！

【华国锋研究】

华国锋“忠厚老实”吗？

陈益南

华国锋在当代中国史上是个什么样的人？

这三十年来，很多人都认为华国锋是一个“忠厚老实”之人——不然，何以已经坐到了中央主席的高位上，却还会辞职下台，还会连做几届一个不能管事的中央委员？

虽然，由于国情，我们对于中央高层很多真实情况，不可能透明的了解，因而，现在对很多高层人事的变化，老百姓是难于真正知晓其具体原因的。但是，毕竟像华国锋这样的高层人物，即便身居铁幕之后，他们终究也还是会通过其执政方针及行事手段，来向世人显露其个人的政治品质与处世品德的。

从个人的品性来看，华国锋是不是一个忠厚老实之人呢？

其实，我们看看华国锋原来在湖南的一些个人表现，便可对此略知一二了。

早在 1959 年庐山会议后，华国锋就对前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彭德怀冤案受害者周小舟落井下石。当年宣传华国锋的热潮中，以“中国共产党湖南省委员会”名义发表的《华国锋同志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卓越继承者》一文中，这样记述道：

“庐山会议前几个月，彭德怀窜来湖南，伙同刘少奇在湖南的代理人（引者注：即周小舟）四处活动，拼命搜罗向党进攻的炮弹。面对着右倾机会主义者的猖狂挑战，华国锋同志挺身而出，给予了有力的回击。他深入农村调查研究，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他作报告，写文章，用无可辩驳的事实论证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必然性和正确性，热情地歌颂了革命群众运动和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痛斥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无耻谰言。”而 1962 年在彭德怀回湘潭县作调查时，华国锋也即向中央有关部门送交了监视彭德怀的机密报告，毫无同情之心，却有置彭帅于险境之举。

如果说，这些还可视为是身在政坛，不得不为的例行官事，还不能认定其是不忠厚不老实。那么，在湖南的文革中，他的不少表现，则实实在在是从未有过

什么“忠厚老实”之形象的。

文革造反高潮中的 1967 年时，湖南省委书记之一的华国锋，一度被得势的造反派们批斗软禁，政治上也被造反派划入了要予以打倒的“另册”。在当时那种情况下，造反派虽说还不能随意将领导干部们置于死地，但要将他们置于被打倒的“走资派”之列，促使中央降其职、罢其官，那还是不难的。当时华国锋如果真没被造反派选中作为“亮相”的革命领导干部结合进入省革命委员会，相反，却被作为“死不悔改的走资派”予以打倒，或将其撇在一旁“靠边站”数年不能工作，那么，像千千万万其他领导干部那样，随着文革运动的进展，他便会经历一个“挨批斗”、“靠边站”、“被解放而重新工作”直至恢复原有级别职务、又最后离休完事的过程，了结一生。这样，华国锋进入中央工作的可能，就几乎为零。

然而，一个叫章伯森的人，却在 1967 年大大地改变了华国锋的仕途与人生航向。

当时，华国锋的同僚——省委中支持造反派的候补书记章伯森，为了让华国锋摆脱困境，也同章一起“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来”，便一方面几次瞅住上京面见中央领导人的机会，向中央反映华国锋的困境，并极力为华美言，建议中央在湖南起用华国锋；另一方面，章伯森又向坚决要将华国锋作为湖南走资派之一而打倒的工人造反派头头，耐心做劝说解释工作，争取工人造反派头头们最终将华国锋定位于“革命领导干部”，拥戴其为湖南文革中的黎元洪，由牛棚解放而送往北京。于是，当时华国锋在“亮相”《声明》中便说：“改正错误，坚决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向章伯森同志学习！”

由此，华国锋便不仅一下子避免了像很多领导干部那样被批斗、被打倒、被靠边站数年的厄运，而且，还先后有机会成为了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位列同为省革委副主任的章伯森之前）、新一届省委第一书记，继而进京入阁。

按一般人之常情，章伯森可说客观上是他华国锋的有恩之人，华国锋当年在其的“亮相”《声明》特别说了一条“向章伯森同志学习！”，就证明他是深知彼时章伯森对他的重要。华对章，不说涌泉相报，至少也应铭记此恩。然而，时过仅一年，1968 年 9 月批判所谓“炮打三红”之际，章伯森受到不公正的牵连，对此，当时在湖南说话已颇有份量的华国锋（省革委会第二把手），不仅没有为章伯森洗刷解脱，反而以怨报德，赞同了军方与部分造反派对章伯森的批判，致

使章伯森被迫在检讨一番后，下放新田县工作数年。

到 1976 年“四人帮”垮台后，曾一度支持过造反派的章伯森，自然成为了清查对象。其时，已位居最高的华国锋，对章伯森在文革中的一切，他不会不清楚，也不会不明白章伯森其实并无什么“篡党夺权”的问题（要说支持了造反派，他华国锋也同样做了）。然而，华国锋却没对章伯森伸以任何援手，说一句公道话，慨然同意湖南将章伯森纳入所谓“四人帮黑手”，进行长达数年的清查。直至使章伯森被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工资降级。

在华与章的关系中，不论章伯森个人如何，他毕竟曾是客观上有恩于华国锋的。在章伯森有些麻烦之际，已做了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却不能根据章伯森的实际情况，给予合符情理的适当证明，助章解脱，减轻其所受处分——而要做到这一点，当时对华来说，简直是小菜一碟。但，华国锋就是不做。这，无论如何是不能表明华国锋为人有“忠厚”之德吧？

文革中在湖南对华国锋曾给予过极大支持的，还有原工人造反派头头唐忠富（中共第九、十届中央委员）、胡勇（曾任省革委副主任，与华同事）等人。且不说在 1967 年 6 月间，是他们代表湖南造反派接纳了华国锋支持造反派的“亮相”之举，胡勇还亲自护送华国锋上北京面见中央领导；更为亲密的是，当 1968 年 5、6 月间湖南开展反“三右一风”（右倾保守、右倾分裂、右倾投降，及右倾翻案风）时，很大一部分造反派将斗争矛头指向华国锋，说华是“湖南右倾翻案风的后台”，是政治上的“变色龙”，提出“炮轰华国锋”甚至要“打倒华国锋”、“将华国锋赶出省革委会”的方针时，又是以唐忠富、胡勇为首的工人造反派，坚决维护了华国锋，大力宣传华国锋是“毛主席的好干部”；并旗帜鲜明地表态：你“永向东”（原省委机关反对华国锋的主要造反组织）敢炮打华国锋，我们工人就要炮轰你“永向东”！并且，果然就随即调集几千工人造反派，一举抄封了反华国锋的“永向东”组织总部。

照理讲，华国锋与唐忠富、胡勇等工人造反派头头的关系是如此亲密，且确曾风雨同舟共过患难，华对唐、胡等人应是很了解的了。然而，在以后唐、胡二次落难之际（第一次是 1970 年整造反派的“一打三反”运动中、第二次是在“四人帮”垮台后的“揭、批、查”），华国锋却从未对唐、胡施以过援手，发过任何适当救助之话，任凭这二次中的湖南当局沉重惩处唐、胡（“四人帮”垮台后，

唐忠富、胡勇均被判重刑)。

如果说，唐忠富、胡勇等毕竟是造反派，“四人帮”倒台后，被清查受惩处是不可避免，但是，当时已位居九五之尊的华国锋，即便政治观点相冲，然若念及旧谊，在湖南省委请示处理唐、胡时，客观上为唐、胡等人讲讲要实事求是之类公道话，使唐、胡等人得以减轻处罚，还是可以做到的。因为，文革的造反活动，无一不有毛泽东的中央文件为据，以此为由来免除受清查者的很多所谓“问题”，简直是太容易了。

然而，华国锋压根就没有做他多少应做的这些。

一个忠厚老实的人，难道会同时又是一个过河即不念旧情的人？

有人可能会说，毕竟唐忠富、胡勇之辈是造反派头头，毛泽东一去世，“四人帮”一倒台，他们注定厄运难逃，就是华国锋想帮也帮不了他们。

然而，同样是工人造反派头头，曾经官至中共中央委员、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的刘锡昌，为何在文革结束后，仅仅受到撤职惩处，而幸免了牢狱之灾呢？而他的党籍，甚至还是到1990年5月，他自个儿提出要退党后，才于7月除了其名的。且不论是什么原因让刘锡昌能有幸逃脱获刑之难，至少说明，华国锋若真想帮唐忠富、胡勇减轻一下所受惩处，显然是完全做得到的。

早几年去世的著名经济学家杨小凯，即文革中的长沙市一中学生杨曦光，因为当年是公开反对华国锋进入省革委会掌权的红卫兵（杨曦光所在的红中会红卫兵、特别是杨的《夺军权》战斗队当时反对华国锋进“新生红色政权”省革委会的大字报，满街都是。），所以，当华国锋在看到了杨曦光写的《中国向何处去》一文的传单后，就连忙在当时的省级干部中打招呼，进行定性。有次，华国锋问前省委统战部长官健平：“你对这篇文章怎么看法？”官连忙迎合说：“我看这篇文章思想很反动。”华则马上声色俱厉地说：“什么思想反动，就是反革命！”（《杨第甫自述——吹尽黄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11月版第308页）

而那时，中央文革陈伯达、康生等人还根本不知道杨曦光这样一个小人物的文章（《中国向何处去》尚是一个征求意见稿，只印发了30份，仅仅在极少数人的圈子中传阅），华国锋却主动将这样一个仅仅是中学生所写的文章，作为重大案件报送给中央文革，导致后来杨曦光被陈伯达、康生点名为“反革命”，被捕入狱10年，直到1981年华国锋失势时，才获平反。

若是一个忠厚长者，又怎么会对一个中学生下此狠手？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对结束文革，对开辟一个新的社会变革时期提供了机会，的确是大好事。但是，由谁来抓“四人帮”，与在粉碎“四人帮”后，欲将社会引导走向何方，却能反映出主持此事者之人品。

华国锋是毛泽东一手提拔的，然而，他却毫不手软地在毛逝世后，将毛的亲属下了狱。

且不说这在中国人的传统文化中是什么性质，至少，这很说明了华国锋的“忠厚老实”究竟有多大份量。

胡耀邦就说过：江青这些人是坏蛋，但是从他（即华）手里解决他们，毕竟和我们解决他们是不一样的。（《师东兵 1988 年采访胡耀邦》）

叶剑英就说得明白：这个事情只有华国锋能这么干。周总理如果在世，干不出来，小平也干不出来。他（叶剑英）也没有想到有这么一下，也不敢想。（《熊蕾：华国锋和叶剑英“结盟”》）

一件连叶剑英元帅都说“不敢想”的事，华国锋却敢在毛泽东尸骨未寒之际便给做了。

因此，你可以说华国锋行事果断，然而却很难说他是“忠厚老实”。

华国锋没搞几年便从高位下台出局，并不是他的忠厚老实（敢于用抓人的方法解决中央领导权问题，能是老实人？），而是当时全国民心拥邓（小平）的压力所致，也是华的政治游戏水平低能所致。毕竟，靠装忠厚而被钦点提上来的权位，虽可以凭借不按牌理出牌之法，一时成功突袭其秀才型政敌，但终究敌不过凭真刀真枪滚打奋斗出来的政治家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陈云就对“凡是”派们发过警告：用抓人的手段解决党内问题（抓“四人帮”），仅此一次，下不为例！由此明明白白地封杀了华国锋在政治角逐获胜中的主要武器。而没有这最快捷的一招，又没有驾驭全局的本事，更没有实质性的改革更新蓝图计划及开创性设想，却想沿毛泽东旧制搞下去，再加上面对的是对社会变革有了新想法的邓小平，华国锋的快速下台，自是必然了。

2008/10/9

【蓦然回首】

一个“从宽”典型的悲剧

李汝高

1965年，我被分配到四川省威远县新店中学当教师。1970年，全县教师被集中到新店区静宁寺，开展了名曰“学习班”的“一批二清”（批判极左思潮，清查“五一六”、“三老会”）和“一打三反”运动。

静宁寺坐落在威远县新店区的四方碑附近。寺庙很大，飞角雕檐，鳞次栉比。抗日战争时期，东北中山中学曾迁到这里办学。中共执政后被作为粮库。三年“自然灾害”后，粮食没有多少储备，这里便空荡荡的。所以全县教师集中在此，毫无拥挤感觉。只是晚上都睡地铺，老师们铺挨铺，一字儿排开，在那种年代，也觉得很宽敞。

“学习班”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学习文件，“斗私批修”。其中也开了一些大会。如对一个建国前参加了中统特务，建国后作了交待并被安排当教师的，再次旧事重提，大小会批斗，致使其受不了而跳池塘自杀。在这个阶段中，我被点名批判，进入了“学习班”的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大多数教师回校，将“有问题”、“未交待清楚”的教师留下来，专门交待问题。第二阶段管理很严，门前有人看守，不准外出，外面亲友来看望，必须经过批准，并有专案人员在场守着谈话。其实这就是外地所称的“关牛棚”。以现在的法治眼光看，叫“非法关押”，而在当时那种无法无天的日子里，却是司空见惯的现象，关人的和被关的，都觉得很正常。

分在我们小组的，有一个女教师L，大约四十岁左右，看来很老实。据说建国前是伪县长的儿子的姨太太，但结婚不到一年，就政权更迭了，她男人被镇压。因她本人也是个受苦人，所以没事，以后长期当村小教师。

她对我们讲了她的“案情”：她给学生上写字课，那时的写字课，不能写唐诗宋词之类“封资修”的东西，只有写毛主席语录和革命口号最保险。她在黑板上书写了毛主席“五·二〇声明”的标题：“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下面写了落款：“毛泽东”。小学生就照着一个字一个字写到大字本上。没想到这就出了祸事，而且是天大的祸事！

“组织”上要她承认，她写的时候落款没有提行，把那个标题与落款连起写，就成了反动标语（“打倒……走狗毛泽东”）。她说是提了行写的。但“组织”说：“人证物证俱在，不承认只有从严。”所谓人证，是几个小学三年级学生写的“证明”，所谓物证，是小学生的生字本。“组织”说：“如果仅仅一个学生没有提行，那是学生的问题，现在有好多本都是连着写的，都没有提行，不是老师教的说得过去吗？”

她对我们讲时很痛心，边说边流泪。我从内心里相信她的解释。小学三年级的学生能懂得写“检举”吗？肯定是大人教的。而且生字本每一行只有五个字格，每一格必须填进一个字，学生写时也不可能想到应该提行。这件事，最多只能说她讲课和批改作业时疏忽了，没有注意到提出要求和进行纠正。她是不可能黑板上那样连着写的。

但是，在那种“学习班”里，我也无法给她正面打气，叫她坚持，只说了一句：“有就承认，没有就不承认。”俗话说，自己下面都还在流血，怎么可能给人医痔疮呢。我曾在围墙面前随便说了一句：“你们看那墙上挂着的藤藤，到底是墙内长出去的，还是墙外长进来的呢？”马上就有人上报，说我企图煽动大家翻墙逃跑。所以我对她只能讲到那种程度。

后来，开了几次“宽严大会”，处理了一批人，同时加紧了对我们的逼供，我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自己做的事就承认，强加于我的罪名坚决不承认。于是，学习班里写了我不少大标语，如“顽固分子死硬派李汝高不投降，绝无好下场！”等等。而L则受到了表扬，因为她终于经不住压力，承认：“既然学生们都说我没有提行写，那也可能没注意，是没提行罢。”于是“组织”马上叫她写了交待。

她私下对我们说，主要考虑到孩子。若真“抗拒从严”，有个好歹，孩子怎么办？然而，她承认后并未完事。“组织”又要叫她“交罪交心，要‘竹筒倒豆子，不留任何尾巴’”。她说，即使没提行，也是无意的嘛。“组织”说，“你的罪行已是铁定的了，你犯了公安六条第一条（笔者注：其实应为“公安六条”第二条。但那时上上下下都是把“恶攻罪”当成第一条大罪的），你知道炮打最高统帅是多大的罪？如果交了心，态度好，可以从宽，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嘛。”“组织”还教她怎么交心：“要结合你的过去来认识，是留恋旧社会的姨太太生活，对新社会、对党和毛主席不满，才这样写的。不这样认识过不了关。”

看来 L 还不太傻，坚持了很久没有这样承认。后来又过了一段时间，突然开了个“首批毕业人员欢送会”，L 竟被宣布为首批毕业人员，并作为其代表发言，这时我才知道，她终于经不住威胁利诱，按“组织”的说法承认了自己的“反动思想”。最后，学习班的负责人还在会上号召我们向她学习，说她一定能得到从宽处理。特别警告“一小撮顽固分子死硬派”，“不坦白交待，只有自绝于党和人民，绝无好下场！”

后来，还“毕业”了一两批，我和部分人员因未按“组织”的要求“坦白交待”，一直到学习班结束，都没毕业。“组织”宣布：我们回单位继续边劳动、边交待问题。

回单位不久，县公安局到新店区开了公捕大会，宣布 L 因“炮打最高统帅，正式逮捕。”很快又判了她十五年徒刑。

我被通知去参加公捕大会，“接受教育”。会后我骂了一句：“这个反革命 L，公然欺骗组织，害得组织叫我们向她学习！”有人马上报告了我校党支部书记×××。他便把我叫去训斥：“怎么，你与她同病相怜么？！”我说：“我是在骂反革命分子 L 呀。”他说：“你以为我们不懂么？你这是在指桑骂槐！你说她欺骗组织，害得组织叫你们向她学习，这不是骂组织吗？”我说：“学习班开会时，领导的确是这样说的嘛。而且说她坦白得很好，可以得到从宽处理。现在抓她，说明她还隐瞒了什么重大问题嘛。”×××说：“她犯了公安六条第一条，‘恶攻’罪，难道罪行还不重大吗？炮打最高统帅，死有余辜。啥子叫‘从宽’？该判死刑的判无期徒刑，该判无期徒刑的判二十年，该判二十年的判十五年，都叫从宽！告诉你，她的逮捕材料，在学习班就上报了，现在才批下来。你不要同情她。”

然而，区“一打三反”领导小组的另一成员，小教支部书记×××在全区教师大会上讲的却不一样：“L 嘛，我们本来考虑她在学习班能坦白，决定给她一个机会，让她在农村边劳动，边改造，争取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可是她极不老实，公然欺骗贫下中农，给贫下中农读报！你是什么身份自己都不清楚吗？”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给贫下中农读报竟成了要从严的新罪行！比较而言，我校支部书记还算老实，说了“在学习班就报了她的逮捕材料”的真话。

对比而言，我这个“顽固分子死硬派”，虽然被送到农村“土劳改”；被勒令在大街路灯下写交待，让我公开受辱；交各单位批斗，并被送到县委大礼堂批斗；

白天劳动，晚上还要守棚子，得了重感冒还被从打针室拖到教室批斗……等等。但终究没有受到正式组织处理。林彪事件后一年多，终于宣布对我的批斗是错误的，予以取消。留了些“三反罪行”尾巴，也在1980年由自贡市教育局党组落实政策，予以全部否定。

而L呢，直到1976年我调离威远，她都还在服刑。后来落实政策与否，何时落实的，我就不得而知了。

因为有了这样一类惨痛的教训，文革中在民间社会就针对当时标榜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流传开了一句话：“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团圆。”

【昨日心迹】

重庆武斗见闻日记

(四)

陈懋智 著

陈琳、陈仁德 整理

陈仁德、何蜀 注释

9.10

昨夜连做噩梦，如乘木船渡凶滩等。反正为琳儿的事日夜不安。

我来李二哥家已有10日，房屋狭小诸多不便，在经济上他们本来已很困难，再加上我就问题更大。从表面上看对我当然没有拒绝，可是的确有些负担不了，我从很多地方察觉这一点。上午同李二哥出去散步前我曾谈到经济问题，并表示坚决按得玖来信办法处理。上午会到一位7月19日从泸县回来的姓屈的妇女。她在泸县工作，就在李二哥对门坐（注：“坐”系方言词，即“住”）。她说泸县从7月5日开始武斗，主要是用刀矛杀，用水龙头喷化学药剂，主要地点在市内和瓦窑坝的化专、医专以及蓝田坝76公里处。基本上是沿公路打。她走后才听说打枪的。但是听说了她走后没得过泸县来信，只收到合江来信。她说从8月1日起

已可过河。她打算过几天从江津返泸县。但我问她茜草坝通机厂的情况她还不知道，她说在对岸问题不大，就怕大炮轰。反正一句话还是问不到泸县茜草坝的情况。

交其汾信时又给李得琼一信附入一并交去。

上午 8 时 15 分约有 20 辆汽车满载战友进城，打算参加交武器誓师大会。下午一时许会毕，共有 200 余辆卡车列队示威过市。经嘉陵路时最后三辆卡车不知怎的竟和反到底派武斗起来，互用棒棍石头，有的被打得头破血流。晚上中央调查团派来三辆车的人调查。

9.11

晨起去嘉陵江大桥，路过 25 年前我工作过的天成厂旧址。当年我住的一间宿舍（楼上第二间）还原形未动，真是令人感慨万千，尤其想到鹏初当时才三岁。仔细看了过去的一些厂房，大桥正穿过旧厂房而过。

下午同隔壁老六步行进城。去时走大溪沟返时走通远门，还去红港（注：即朝天门码头，文革中“破四旧”时改名）看了一下。临江门城外一些房屋毁于炮火中，解放碑交电公司一片瓦砾，不少残墙独柱欲坠欲倾，昔日富丽建筑而今已成废墙。解放碑一带商店几无一家开门。行人不多，只是大字报贴得举目皆是。一过小十字更是路断人稀，至红港那就更是行人寥寥阴森可怕。长江江面停着两艘巨轮静悄悄地无半丝煤烟。昔日人山人海往来行人拥挤不堪的朝天门，而今变成冷冷清清如深山古庙，令人大有今昔之感。港务局大门紧闭。再绕陕西街，见有轮船消息和买票办法：先登记领号数，以后凭号买票。据公布明天有船开万县忠县，售已登记的一批客人。看来回忠县还是问题不大。

9.12

早上在上清寺走耍，偶遇忠县人朱述珍，她是 53 年调来此间经委工作的。闲谈约半小时。

下午反到底派上缴武器 50 余卡车，各型炮弹俱有，浩浩荡荡颇不简单。看来武斗不会再搞了。买了一份九二一战报，写红港水战情况甚详。拟给家里寄去。

今天细雨连绵已感寒意，在大桥上再次看到 25 年前的宿舍。下午雨愈又去

牛角沱一带走走。

9.13

早上大雨，昨夜已感被薄。二哥一再嘱我自行设法解决衣服问题。

上午去两路口，见有泸州消息大字报一张，内容主要是9月5日省革筹、成都军区、宜宾军分区、武装部已正式宣布将武器交给红旗派，并令麻联站（注：即红联站，当时造反派对自己认为是保守派的群众组织均讥称为“麻”，因文革初期保守派组织曾得到党政领导支持，发给夜宵饼干、麻饼之类，故有民谣云：“保皇有功，麻饼两封，保皇有赏，饼干二两。”）立即将武器弹药全部交出。10月8日武装部发出通知：1、小市、泸州于10日晨4时全部解放。2、残匪（注：指红联站武斗人员）退至茜草坝、罗汉场一带。已为我红旗派包围。3、希“9.12”立即回泸州医专共同战斗，争取胜利。下面落的泸州医专9.12日。看来这张大字报时间最近，消息最确。茜草坝已被围问题很大。陈琳的安全太使人放不下心。茜草坝并无多大。万一李得琼没有走，一旦打起来怎么得了。唉！我简直要为此而乱了。真是神天鬼使，怎么选了这个时候出来。

今天中央广播，昨天北京开了镇压反革命大会，宣判数人都是破坏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挑起搞武斗的。听了使我为之一快。

下午进城到李成玉家，她的儿子易正春7号才回忠县去了。我找她借了一件棉衣，五斤粮票，并在她家吃了灰面粑。耍约一小时仍步行回上清寺。沿途大字报贴得不少。市中区人较多。去轮船登记处看，有忠县人数人在登记但一人不识。

9.14

上午9点去大田湾体育场看反到底派开誓师大会。到会约10万人十分热闹。中央调查团首长也讲了话。会后游行，五、六人一排，一直过了两个多小时。这样大的会我还是第一次看到。

接得玖9月1日来信（是由大渡口转来）主要：1、寄来粮票27斤。2、久未接我、琳、森来信非常担心。3、忠县保派已垮台，谢树亮等逃跑。何家声、

杨成明、徐大州、刘岔口、沈明才等被斗被揪。4、七弟已于8月12去汉口，途经云阳曾遭枪击。5、忠县亦曾一度紧张，不敢上街。6、森儿等66级学生将回忠县。6、忠县林场亦空无一人。7、嘱问钢背心价及定制处。8.仁德去巴营突发高烧。9.冯光芸将去贵阳。10.她已参加造反派。

见了来信使我高兴，家里平安无事。使我担心的是她的病仍未全好，右眼有些雾，右耳有些失听。主要是由于心脏移位的关系，想在渝做钢背心。看信后即写回信：1、泸县武斗情况，千方百计想和琳儿联系过程。2、告在渝生活情形粮钱情形。3、易正春来忠县。4、重庆目前形势。5、储德未来渝。6、问8.5来信是否交挂号。信写好拟明天进城找便人带。如无便人带再交邮。

李二哥家今午吃肉。从武斗到现在有近两月未吃肉，今天每人供半斤计2斤半。我去看游行回来较迟（下午二点多），肉饭均凉。

晚上去上清寺听“完蛋就完蛋”广播（注：反到底派“完蛋就完蛋广播站”原驻市中心交电大楼，因该处已毁于武斗炮火，广播站此时迁至上清寺工业展览馆）。

9.15

昨夜今晨几次欲呕又拉肚子。

天刚明起身再写几句并将两份战报卷好一并寄回。经大溪沟进城，在解放碑看见一张大字报，十万火急泸州告急：红旗派从3日起就将我红联站重重包围在高坝化工厂一隅，已11天，距国防工厂（255厂）仅一公里。红旗派凭现代化武器，大量发射火箭炮等。厂房已遭到严重破坏，死伤已达千余人。请中央派飞机来阻止进攻。目前支左部队又未开到。这张大字报说明目前被围的地方是在罗汉场了。同时也说明泸县到14日止还有严重武斗。当将这张大字报内容抄在信壳面上。

进城去陕西街旅客登记处看有无忠县人，适看见有一通知说今天上午11点东方红105号开万县在红星码头上船。当即急速走到码头，适碰见水电局王鸿敏乘此轮回去。当即托他带走，并在码头上闲谈。他也说了一些家乡情况。旋张欣桀亦来，他是转泸县，因武斗不能去，只好折返忠县。王负责到忠县后即交家中，

这是很不容易的。此信最迟明天可交到得玖手。离开后又去李成玉家还粮 5 斤，并在她家午饭。三点多钟又步行返上清寺。

9.16

李二哥家今天杀鸡一只，惜味淡歉然。

午饭后去上清寺散步巧遇忠县青年六人。一为邻居石妹（程天富），一为十字街欧应武，另二名为精华林场的张波林、周康银等。他们是 9 月 4 日离忠的，是拟来此投靠反到底派的。在南岸住了七天，今天来城。我带他们去走了大田湾体育场、大桥等。据说忠县李遵禄、张光政等已囚于公安局，袁顺成等反戈后已去万县参加武斗当机枪手。忠县市场一直未受影响。他们每人都穿一件单衣也未多带钱票状极狼狈。后持主力军（注：当时四川省万县地区的造反派组织，全称为毛泽东思想主力军万县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介绍信去市革筹解决了回忠县船票和免费食宿问题。后又一起去两路口找杨光琼未遇。

9.17

整天阴雨，中午稍细。我去上清寺看大字报竟突响两枪路人惊逃。

写信三封，一给得玖主要告做钢背心事。一给八弟告我尚留渝未走。另一给陈琳告张波林等来渝及林场目前情况。

傍晚冒雨去大礼堂晤几位忠县人，他们已弄好船票定 20 日回忠县。我和他们谈两事，1、将介绍信给我。2、如再往下走将仁德带去。他们完全同意，并叫我写信，因欧应武等还准备去上海。

9.18

今日中秋整日阴雨。此间无一点过节迹象，月饼糍粑影子未见。早饭后给仁德一信告与欧等商谈并支持他外出。

下午雨息又去火车站、菜园坝碰有无从泸州来的人，结果未碰到，返来在两路口碰到欧应武等。又看见三张专门报导泸州消息的大字报，主要是从 7 月 6 日起一些大的武斗情况。但始终看不出究竟在什么地方打。从大字报看死伤都为学生，同时保派已于 9 月 3 日彻底垮台。我将此情况立即写信转告家中。

9.19

早饭后进城问假肢修配厂。问到原厂址太平门四方街地方已早搬迁了。问附近居民据说已搬到南岸四公里，又说在杨家坪（注：此处原有空格）处。但另一人却说要问储奇门搬运站侧一个补鞋的。又走到储奇门问来问去仍未问到十分歉然。

路过二府衙去公园路找到了十几年不会的忠县人陈宗文。果然找到了，住的地方简直不像样，狭得来只能打个转身。他在打饼子，爱人在卖冰糕，看来经济很窘。坚决留我在他家午饭。临走时给我可能是 10 斤粮票，我坚决不接。推来推去结果他仍塞在我口袋里。待我回来看时只有八斤零一半张，定是当时拖断了的，共有八斤半。他为什么给我粮票呢？我想他做饼子生意，粮方便。另外他说我外出缺点。谈到他弟弟陈宗凤，他说仍在兰州军区作文工团长，《柯山红日》是他编写的，但已有几年未通信。他还谈到他爱人张某，是忠县王世槐同志爱人张顺容的姑娘，64 年还到过他家。我去时正碰上一凉山的忠县工人余某原在忠县修过铁路，我亦认识。

饭后又去李成玉家，李托我找便人给他的孩子带衣服到忠县。计毛线衣一件，蓝长裤一条。我又在此写了一信。

到陕西街，见轮船 110 号明晨 7 时开忠县。漫步经解放碑、大溪沟、至人民大礼堂，找到几个忠县人，他们决定于明天返家。并就此晚饭，天黑返上清寺。

大街上有关小学开学的大字报，说小学定 8 月份放假 10 月份开学。又有主席最新指示，今冬开展农村文化大革命运动。

陈琳仍无信来，令人焦虑不安。

信托程天富带回，并一再嘱托如外出定邀仁德同去。夜听“完蛋就完蛋”广播至 10 点才回来。

9.20

今天思想格外烦躁，泸州仍无信来。惠荪下午突然乘火车去蓉，写信都来不及了。八哥也无来信，急坏我了。

早饭后写信给储德告近状，上午已投邮。早知惠荪要走叫她带到成都去交多

好，要快。下午无聊去李光兰家，她为我煮鸡蛋三个。到处吃别人，我再三推也推不了。

据惠荪等说另一派昨天还在抓人，杀4人。不知传说是真是假。惠荪去火车站适成都客车已开，返回待明天再走。

9.21

早饭后忙写两封信，一给乐至得鐔八哥，一给成都十弟。均托惠荪路过资阳和到达后交邮，这样免在渝邮局堆积误时。惜储德信昨天寄出，否则今日一并带至成都交邮要快得多。八哥信内仍请大力打听泸州消息，并告我经济情况。十弟信则告重钢仍在抓人，考虑再回来。

一天到晚心烦意乱，巴不得琳儿一步就出现在我面前。邮局同志交信总是扬长而去。这两天来硬是度日如年。

午饭后稍睡。

惠荪已和另一同学去成都，买江津票。我一再嘱她两信定要按时交，并在车上注意隆昌上的旅客问泸州情形。又嘱到蓉后问候李四嫂和惠兰。我同其渊一道去两路口、菜园坝一带去耍，边看大字报。我问一位乐山船员，他说三四天前有人来说泸州已撵到新路口、弥陀场、合江一带打去了。

9.22

早饭后同其渊去火车站，碰成都来车带有泸州乡音的人，未遇。又去黄沙溪找泸州木船。一船员告我早上有一冬瓜船开到菜园坝去了，看样子定是泸州船。我急忙回头至菜园坝河边，果见河边正在起冬瓜。上船一问果然是泸州来的，而且还是昨天早上才从弥陀场开出来的。我高兴极了，当找到一位姓胡的驾长。据谈泸州武斗的确厉害，几进几出逞（注：“逞”系方言词，含按住、压制之意）来逞去死伤的人不少。他具体告诉我一些武斗地点，最凶还是在三道堤附近的江城旅馆。现在泸州保派已退到罗汉场。泸州江面的船只（轮船木船）尽为保派驾走。现在过河的船都是宜宾调来的。渡船车子已通航，只是沱江大桥已被破坏不能行车，走路还是可以。但上下船只仍不通，因罗汉场被保派所据，近百只船被留江面。同时还在继续战斗。当我问到茜草坝时他说打得凶！打得凶！用刀杀用枪打，

茜草坝都干了几趟。那里老百姓都跑光了。我问烧过房子没有。他说蓝田坝烧了房子的。当听到茜草坝几进几出时心里不免打了几个冷噤。幺妹他们该会躲避吧，不然怎么得了！他还说泸州市面已渐恢复，可以扯布（注：即到商店买布）了。公安部门已发出通知，从9月13日起凡外出居民一律返回原地。如到20几（？）还不回来以后就不上户口。又说弥陀场米原卖1角几一斤，现已卖到二角几。在茜草坝桂圆林里卖衣服的老百姓不少。他们的木船大约在后天就转泸州。上水要走7天，押运员明天就要乘火车转去。我拟写信托押运同志带到泸州交邮，他完全同意。

返寓即写两信，一给其汾托再到茜草坝问问幺妹情形。同时又给幺妹一信问平安。

下午再去菜园坝冬瓜船上，并会到押运员，和他谈起泸州情况。他说其他和上午胡驾长所谈差不多，只是谈到茜草坝打的问题，他说原来茜草坝没有正面打，只是城里用机枪向通用厂射击。本月3日聚集在蓝田坝的红联站被一二十县的革命组织围攻，被迫逃到茜草坝。红旗派跟踪追击，在茜草坝打了一夜一天，红联又退到太安场。我问通用厂打得怎么样。他说没在厂里打，是搬到山上打的，沿着公路打。这一来我又有点放心，不在厂里打问题就不大。不过据他谈起来打还是打得凶的，死伤是很大的。心里越放不下。

这一向来想问的泸州情况今天算是问得最清楚了。

过火车站时适成都车到。问到一位隆昌人，他说泸州到隆昌汽车未开。还有那位押运员还说张国华最近到了泸州，问题要彻底解决。他并保证把我信交到（已贴好邮票）。想来几天内是会得到陈琳来信了。

9.23

今天收到两封信。一是十弟9月16日由蓉来信，说离渝后就一直未接我的信，并想回家。另一信是储儿来的信，信上担心姐姐安全，是9月11日写的。当即复森（储）儿一信详细说了姐姐那里久无来信及问到的泸州武斗情况。

9.24

等泸州来信今天又失望了。

一天无聊除上街看大字报外，一路看耍把戏卖打药等等江湖骗人小子。储德信今日才投邮。

9.25

早起去李成玉家，午饭后又慢步返回。途中总想回去定能见到泸州一封来信，可是一回来仍不见半点泸州消息，令人十分失望。

在李家将仅有的一套制服换下来，找李借我一件换上。我拟自己去洗，殊（不知）易坚决不要我洗，而由他帮我代洗，真是惭愧已极。洗后不半天在烈日暴晒下就干了。我又重新穿上，这才是穿“赶水衣服”。

去李家还看见一封9月17日上午从泸州福集场的来信，对泸州情况还谈得比较清楚。现抄于后：

从泸州武斗开始不久，隆泸路就不通车，邮电也停止，最近造反派占领了泸州才恢复了交通和邮电。但公共客车还没有开始运客，公路上往来车辆全部是为造反派工作的。泸州地方本月上旬就由红旗造反派占领。现在正在攻击茜草坝和罗汉场兵工厂。这两个地方恐怕还有些战斗。我们场上前一些时间也有武斗的现象。有些居民和机关家属一部分逃入了农村。我们一次也没有走。××于9月初就参加了红旗派，在泸州地方扛上枪。隆昌到福吉一带路是通行的。只要是红旗派观点的人在隆昌接上了头，就能搭车来福吉。 9月17日上午

从上信看来隆泸客车仍不通。

返来在途中见有泸州红联站来渝向中央调查团求救的大字报，对泸州武斗情况也谈了些，总之一句话打得厉害。报导中提到几次大战役都在大街上，钟楼已烧毁。并说泸州已无一条完整的街，一间完好的屋。又说茜草坝已失守。大街是提的小市、南门口、三新街等。拟明天再去看仔细一点。

收到四封信。一是十弟9月19日从成都来信：五哥，玲珑请假下乡去了。

听说重庆很平静，又听说回重庆的不少。如你也听到大批人员已回大渡口并恢复了生产的可靠消息请即来信。家里的门除暗锁外另外有一把锁是烂的，你可以敲开。你喜欢怎么吃就怎么吃。陈琳有信回来否。寿春调阿坝路过这里我们见面了。他不慎掉了百多元钱。我已去信告诉储德。七哥的信给你转来。这里寄一元钱给你。本拟多寄几元，因考虑即将返渝。一是七弟 8 月 21 日由汉来信告已平安返汉。一是 9 月 1 日得玖来信。谓久未得我去信全家担心。又问森儿来重庆没有。同时仁德又在信尾批了几句，都是问我的安全。一是得玖 9 月 19 日在汇款 25 元的条子上批的附言：桂、王带的信收到了。我 8 月 5 日、9 月 11 日两次平信交新弟收，收到否。8 月 5 日的信肯定是高收了，要清。9 月 16 日接森儿 8 月 10 日信。主要谈身体好，已出工搞清口工作，未提回家事。9 月 17 日接八哥 8 月 13 日信埋怨么妹数月无信及琳儿为何不去。徐诚（注：作者外甥，时在成都铁路局 103 厂工作）9 月 1 日到渝，9 月 7 日回忠，因候船未来找你。精华曾去二信及多次带信，据说粮票困难，一两未退。现只有三个人在林场。陈叔于等十人最近又上京。琳儿假期无问题。二哥病好些否？

今天虽接了四封信，但仍不解决问题。为什么不接泸州的信呢。

家里兑 25 元来，不知他们怎么过，见了这张汇票心里沉重得很。

晚上又听到隔壁人说，对门有个在泸州读书的学生刚由泸回来。明天拟去访问。

过七星岗碰见 30 年前在汉口的一位熟人何继刚，他仍不减当年英俊。他一见我便问你怎样瘦。正好 30 年前的 10 月 24 日我们在武汉分手，25 日武汉失守。

9.26

泸州消息得不到就像大病没有好，一天总是痴望着如何能问到一点可靠消息。昨夜说的那个女同学今天找到了，但她是 7 月份就离开泸县了，也是在等候泸州来信。

惠荪去成都今天中午就回来了。她在成都惠兰处见到其汾 17 日从泸州去的信，其中提到其灏也在街上被冷枪打死。我问信上还提了得琼没有。她说没有提，又说隆昌来的客不多问不到情况，只是听说泸州打得凶。

上午大田湾斗争任白戈，参加大会的有几万人。但临时改为庆祝毛主席视察六省市回京大会。返来在路上碰见刘玉茹，和她谈到病的事，她说一点不感觉，也未吃过药。她的儿子罗家声去年大学毕业后还未分工作。她一再问到得玖的病和我的娃儿，并一再请我去耍。

中午得忠县来信是托人来重庆交邮的，信内只简单写了几句，托张开文带来绒衣一件，长裤一条。并说9月20日还给我寄有一信。下午我即照信上所写地址：张家花园151-61号，会到张开文略谈稍坐，一再感谢后辞走。这一来不怕冷了。

返来又去邮局问，泸州电报已通了，但今天不能发，时间已过。拟明天发一电报去问，看能接到否。

9.27

早上去菜市场又碰见朱述珍在买菜。

给家里写信将听到的一些泸州情况都写上，并拟分写三份：一寄忠县，一寄乐至，一寄壤塘。下午又去看大字报，一直走到七星岗天忽下雨才匆忙回来。心想去问泸州红联站的住址，可是总是问不到。在途中有卖冰橘子水的，六分一杯。我把钱都取出来，考虑很久仍决心不喝把钱放进包里。

晚饭时有位姓解的妇女突来找李二嫂，说她家在泸州读书的娃儿今天回来了。我放下饭碗立即随这位妇女去她家找这个同学。据说他是昨天从泸州动身的，乘车到隆昌走的。泸州的情况：1.武斗时间较久。2.主要是在城内，南城打北城，三新街（即大十字上面），南门口，钟鼓楼一带最凶。三星街几乎烧光，钟楼也烧毁了。3.死伤人员不少，平均一次有200人左右。4.茜草坝是武斗重点。通用厂门口装有两门大炮。城里机枪经常向茜草坝射击，主要是打船。5.红联站在茜草坝是主动撤走，并未战斗。但红旗派一直追杀。茜草坝打了一下午又一天。死伤听说不大。6.撤退时茜草坝的居民几乎全部随红联走了。尤其当权派和家属更走得更多。在路上走不动的老弱就甩了。7.红联一部分人被抓。8.现退在罗汉场已被重重包围令其缴械。9.现在罗汉场一带仍有战斗，但不对255厂攻击。因是国防厂要保护。10.汽车只能进泸州不能出来。要防止红联有人跑。11.轮船不通，汽车也未开始运客

听了这位姓解的同学说了后心里又是放心又是担心。放心的是泸州并没有那样厉害。担心的是邓其寿是当权派，如跟着到了罗汉场就很难说了，那就更危险了。这个学生准备明天返泸州，我托他带封信去泸州交，他完全同意。

大联合送喜报的，路为之塞，锣鼓喧天欢声雷动，昔日战场敌人而今又是一家人了。

9.28

早上我饭后去找那位解同学未遇到。忙给琳儿一信告来渝路线，并问平安。信已贴好邮票拿到解家托带又不遇。中午忽得泸州一信。其渊持信飞告“泸州已来信了”，其时正在给乐至得璋写信，我翻身一看果然是泸州来的，但信壳又不像是琳儿写的。拆开一看确是陈琳来的，真是喜出望外。李二哥家老幼都非常高兴。看完信后又急忙写上一封信加在给泸州得琼么妹信内。我主张琳儿去宜宾再转乐至。我高兴得字都写不下去。写好后又去交解带走。这一来真是阿弥陀佛，一天之喜。立即去给家中发电告平安：忠县糖司李得玖琳安智。发电报的人太多，排轮子达一小时以上。据邮局告此电今夜可到，不知家里看到电后高兴到何等地步。

琳儿来信：

爸爸，您好！

我自从6月23日给您来了一信后，由于泸州7月5日发生了武斗，从这天起茜草坝到处都戒严，布上电网，不许随意走动。尤其是么姨家一来是当权派，二来是观点不同，更是要对我们的行动加以控制。并且江面上也封了渡。虽说茜草坝不是战场，但他是红联站的大后方专造武器。红联站的人对我们像敌人一样。爸爸7月2日的信正好在武斗前收到，但我无法回。7月7日和7月14日的信直到9月16日才收到。当天么姨家收到了约10来封，其中我5封。妈妈两封都是7月份的，森森一封6月27日的。于是我立即回信。因过不了河今天才拿

去交。交后到小市三舅家其汾表哥家看到您们的来信，方知您在二舅家。

泸州的武斗由石头、砖瓦发展到钢钎、硫酸镪水、枪炮，由城市打到乡村。起先通机厂算比较安全的。在9月11日这天下午红旗派打过来，由于红联站事先无准备还在开会，所以没打多久就急忙逃走了。据说他们原准备在逃跑之前暗杀一批人（红旗派的），很可能有我们。只因后来时间来不及了，所以我们才没被害。现在红联站并没跑多远，就在我们这座山背后。红联站所有的人都集中在那里，势力还比较大。我们经常都听得见密集的炮声，一天到晚从未停息。目前我们的处境十分危险，他们万一打转来我们一定活不成。这里已是三个月没有发工资，看来一时还发不成。据说要调查清楚了没有搞武斗的才发。红旗派不算武斗，他们是自卫还击。我们的生活十分困难。大红二红又有肝炎，姨爹姨妈身体又不好。我和外婆倒没问题，反正再艰苦的生活都比农村好得多，我还是住得惯。我只是十分想回家。并且我觉得长期在这里使么姨他们增添了困难，很是过意不去。路费都没有怎么回来，听说路上也很乱。我对重庆的路一点也不熟，真急死人。我出来三个多月了没给场里写过一封信，以后回去怎么好。

么叔到成都，么婶陈琼是否也去了？您住在二舅家，他们都那么困难怎么办呢？我又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我不论是坐车、船您一定要来接我，我是一点路都不晓得呀。来接时千万小心别碰上武斗。近来不知妈妈为我急成什么样了。您写信一定好好安慰她。我反正还活着，我身体也很好。只有森森的情况一点不知道，我很放心不下。我可能要到宜宾，因这里不安全。您回信可寄么舅那儿。二舅的病好些没有？希望他老人家一定好好休养，不要担心我。三舅一家老少均好请放心。

琳儿 1967.9.22

看信后立即写信两封。一给宜宾嘱其定去乐至走一趟。一给八哥告泸州琳儿来信并原信抄转。

晚饭二嫂弄姜爆鸭子（二只鸭二元），我特去打酒半斤为琳儿平安庆幸。

（下期连载之五）

【文摘】

初澜批“黑画”文章何以“夭折”

李 辉

“初澜”是文革中著名的写作班子的笔名之一。当年的不少历史过来人，想必对这个笔名耳熟能详。

读戴嘉枋著《走向毁灭——文革文化部长于会泳沉浮录》（光明日报出版社，1994年4月第一版），得知文化组（包括后来于会泳任部长后的文化部期间）的写作班子主要有四个笔名：初澜、江天、宿燕、望浦。其中，“初澜”排在第一，一般用来发表被认为最重要的文章。从一九七四年年初“黑画事件”拉开大幕，到一九七六年十月“四人帮”下台、文革结束，是“初澜”最为活跃的时期。

按照一九七三年底“初澜”发表的《要重视文化艺术领域的阶级斗争》一文，即将展开的一系列文艺批判，将涉及戏剧、音乐、美术等。事实上也如此，一九七四年一月、二月，在短短两个月时间里，《人民日报》就相继发表多篇文章展开对德彪西无标题音乐、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的纪录片《中国》、晋剧《三上桃峰》的批判，而且常常拿出一个又一个的整版版面，攻势猛烈而集中。“黑画展”在此期间举行，《北京日报》的批判文章也是在三月发表。可是，《人民日报》上唯独美术批判缺席，原定组织的“初澜”批判文章，并没有按原计划如期公开发表。

一九七七年以“文化部批判组”名义发表的《一个精心策划的反党阴谋——揭露“四人帮”“批”黑画“的真相》（五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其中简略地

谈到了一个重要的与“初澜”文章有关的细节：

为了大造反革命舆论，“四人帮”在文化部门的亲信授意他们的御用文丐“初澜”，炮制了一篇又臭又长的批判“黑画”的文章，准备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这篇文章非同小可，张春桥、江青、姚文元都作了亲笔“批示”。但做贼，总不免心虚。特务张春桥最后批道：“暂不发表”，“待适当的时候再讲”，统一了“四人帮”在“黑画”问题上的部署。

这是最早透露出的关于“初澜”文章没有发表出来的信息。

我万万没有想到，距透露此细节的文章发表整整三十年之后，文中所提及的涉及“黑画事件”的批示原件，竟然在二〇〇八年的春天浮出了水面，并令不少收藏爱好者眼睛一亮。也真是机缘巧合，它凑巧落在了黄永玉手中——他是“黑画事件”当事人中依然健在的少数几人之一，由他收藏此文献，当然有着特殊的意义。

薄薄一页纸，分量何其沉重。

这是于会泳一九七四年三月二十五日写给姚文元的一封信，在上面先后做批示的依次为姚文元、张春桥、江青。于会泳用的是一页“全国美术作品展览办公室”的红头白底信笺，不知为何没有用“文化组”的公文信笺，也许因为文化组是临时部门，当时尚无自己的信笺？

该信全文如下：

文元同志：您好！

我们评论组在美术组的协作下写了一篇反击美术方面黑线回潮的文章。送上请审阅、修改。如可以希望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经与△△……王曼恬等同志研究，这篇文章中点了两个人的名，即宗其香和黄永玉。该二人，在历史上、文革之前和文革之后，表现都是很坏的。

此致

革命敬礼！

会泳

1974 . 3 . 25

信中有一人用“△△”代替。黄永玉分析，此人应是著名版画家古×，当时被结合在文化组里协助王曼恬负责美术工作。令人不解的是，于会泳为何隐去其名字，或许是他觉得此处无必要提及？待考。

收到于会泳的请示后，姚文元并没有马上批复，而是拖了一周之后，才于四月十二日作出批示，并送呈张春桥和江青。姚文元批示用铅笔而写，由上而下，在空白处随意写来，布局颇不规范。批示如下：

关于批判一批“黑画”的文章，在我这里压了一些时候。主要考虑到：这类“画”如一批判，在国外肯定身价倍增，可以卖更多的钱，且画较形象，易被敌人利用造谣污蔑我。因此想了两个方案：（一）在北京日报上发，不转载；（二），暂不发表，待在某一时候正面介绍我社会主义艺术成就时有一个部分提到这些毒草。那个方案较妥，请春桥、江青同志阅批！

姚文元 12/4

两天后，四月十四日张春桥做出批示：

我倾向暂不发表，先在内部批，待适当的时候再讲。请酌。

春桥 四月十四

一天后，四月十五日，江青最后做出批示：

同意春桥同志的意见。1974.4.15

读了这些批示，“初澜”文章之所以“夭折”之谜水落石出了。

于会泳对“初澜”批判“黑画”文章的态度，以及相关的历史背景，戴嘉枋在于会泳传记中这样写道：

这篇稿子于会泳收到后，看也没看就直接叫人送给了姚文元。不知是不是姚文元也忌惮周恩来的威望。他对这篇“初澜”批“黑画”的文章，作了一个含糊其词的批示，然后打电话给于会泳，说：

“这篇文章还是不发了吧！对不起了。”

“行！可以！”对姚文元扣发“初澜”这篇稿子，于会泳打心底里感激不尽。不但毫无怨言，反而感到有一种如释重负的轻松。放下话筒，一屁股坐到了椅子上……

从批“无标题”音乐察觉到江青等人借“批林批孔”，将斗争矛头指向周恩来总理，于会泳就害怕了。作为直接受江青、张春桥领导，机构又隶属于国务院的文化组副组长，他经常感到自己处在一个无所适从的地位。（《走向毁灭——文革文化部长于会泳沉浮录》）

显然，作者并不了解于会泳信的内容。读于的信，看不到他的“含糊其词”，相反，他对宗其香、黄永玉两人的严厉表述，今天读来还是令人不寒而栗。因此，此处对于会泳心理所做的分析，恐怕不能成立。至于他对于会泳接电话场景和对话细节的描述，是确有此事，还是虚构？不得而知。

查阅一九七四年四月十五日之后的《人民日报》和《北京日报》，可以发现，对于“黑画”的批判，正是按照姚文元等人批示精神进行的。

先说《北京日报》。四月之后，《北京日报》只在六月二十七日发表过一整版

的批判“黑画”文章，其中一篇长文题为《从黑画看林彪“克己复礼”的反动实质》，作者“龚辉文”。这篇文章的基调乃至文字，与三月发表的文章大致相同，受到批判的依次仍是黄永玉、宗其香、李可染等画家的作品，但同样没有公开点名。

与上次相比，对黄永玉的批判这一次新增加了《动物短句》的举例，并把他的文革前的这一创作作为重点。这也许是为了印证于会泳对其所作的“历史上、文革前文革后都是很坏的”之评价。龚辉文写道：

黑画的炮制者们也采用含沙射影、指桑骂槐的卑劣手法，向无产阶级专政射出了一支支的毒箭。有一幅画，“别具匠心”地画了一只睁一眼闭一眼的猫头鹰。要知“猫头鹰”的矛头所向，不能不联系作者的另一“杰作”《动物篇》进行分析。一九六六年初，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即将来临，“猫头鹰”的作者气急败坏，在黑寓言《动物篇》中，借蜘蛛、蛛蛛蚌和沙鳖的口恶毒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污蔑无产阶级专政下，“一个小小的疏忽，往往带来生命的危险”，造成“人类的文明在可悲的倒退”。我们看，这些动物，在作者的笔下竟然有着鲜明的阶级爱憎，恶狠狠地讲着与现实阶级斗争密切相关的语言。这哪里是什么动物，分明是地主资产阶级的化身！这些“动物”们的胡言乱语，与林彪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是“专制”、“独裁”、“绞肉机”的谬论何其相似乃尔！“猫头鹰”就是《动物篇》的续篇。（《从黑画看林彪“克己复礼”的反动实质》）

再说《人民日报》。自上述批示出来后，《人民日报》不仅没有发表“初澜”的长文，而且连一篇专门批判的短文也没有发表，只是偶尔在文章中简单提及一下所谓“黑画”。譬如，一九七四年四月二十六日，发表中央五七艺术大学洪毅达批判孔子的文章《古乐的狂热卫士——新声的凶恶敌人》，其中有一句：“他们还仿效孔老二写‘变天账’，躲在阴暗的角落，炮制黑诗、黑歌、黑画，利用文艺形式为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翻案。”一九七四年十月十日，发表大庆油田钻井

工人黄元贵文章《社会主义美术创作的新收获》，其中有一句：“但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要看到还有一小撮人，他们仇恨无产阶级专政，躲在阴暗的角落里炮制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画，妄图效法孔老二开历史的倒车。”仅此而已。

一九七四年国庆节期间，北京举办了《全国美术作品展览》，十一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小峦“的文章：《时代的画卷 战斗的艺术——〈全国美术作品展览〉观后》，文章在高度评价此次展览的成功时，显然遵循了姚文元“待在某一时候正面介绍我社会主义艺术成就时有一个部分提到这些毒草”的批示，以下面这种形式提到了“黑画”批判：

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美术作品的大量涌现，是社会主义美术创作繁荣的表现，是美术战线形势大好的根本标志。但是，大好形势下仍然存在阶级斗争。林彪反党集团利用美术颠倒历史，树碑立传，为其在政治上“克己复礼”制造反革命舆论。林彪反党集团被粉碎后，美术界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继续利用绘画兴风作浪，歪曲丑化社会主义现实，发泄他们对党对社会主义的不满和仇恨，不久前被揭露和批判的一些黑画就是这样的货色。在他们的笔下，光明变成了黑暗，幸福变成了灾难。（《时代的画卷 战斗的艺术》）

这是在《人民日报》上找到的唯一正面涉及“黑画事件”的文章。

至此，可以明确地说，无论在《人民日报》或《北京日报》，批判“黑画”时，都没有公开点任何一位画家的名字。

可是，为什么人们回忆往事时，众口一词地认为当时报纸上公开点名批判了呢？

我想，有一个重要原因，发表在《北京日报》上的两篇批判文章，都具体点出了画作的名称以及画面内容，熟悉这些作品的人，自然知道作者是谁。因此，当他们在报纸上看到或从广播中听到对这些作品的批判时，也就很容易认为那就是点名批判。

另外，据高××所写材料，当时他曾参与组稿，并在文化组的内部刊物上发

表过一篇文章，文中的确点过一些画家的名字。他写道：

在批“黑画”的反革命活动中，经我积极组稿、授意提纲并参与修改发表在《文化动态》上的《美术战线阶级斗争情况》黑材料中，乱打棍子，乱扣帽子，点了吴作人、黄永玉、李可染、黄胄、李苦禅、林风眠、陈大羽、周昌谷等十几位知名画家的名，把他们打成“黑画家”。对这一黑材料，我有一份罪责。

左×所写材料也证实了这一情况：

在“批林批孔”中，当时美术组的高××向于会泳等人汇报了美术界的“黑线回潮”问题，张××布置我去美术组约稿在《文化动态》内刊上反映。我向美术组五六个人传达了姚文元对出口画的批评（在创办全体会议上于会泳传达的），要求他们按这个精神写稿，反映“美术界黑线回潮的问题”。他们写成《当前美术战线阶级斗争情况》的内刊稿，经我修改由张××审定登上《文化动态》……（《我的交待检查》，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无疑，可以确信当时文化组的内部刊物《文化动态》上，的确发表了一篇点名批判的文章。如此一来，也就不难理解，亲历者的记忆中，为何大都留下了曾被报纸公开点名批判的印象。

三十几年后，终于看到一份与自己命运攸关的历史批件，黄永玉难免感慨万千。他郑重地将它装裱起来，挂在卧室里。

他在与一段不堪回首的历史相对。他也为自己庆幸，突如其来的风暴，因为姚文元的犹豫和“聪明”而戛然而止，避免了更为猛烈的点名批判。他甚至愿意从好的方面来理解。他说，四十年代后期，他在上海曾去过姚蓬子的家，见到过

比他小七八岁的少年姚文元。“也许他还记得，有意无意中保护了我？”面对批示，黄永玉感叹万千。

当然，最重要、影响最直接的恐怕是当时的政治变数。

据《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二〇〇三年十二月），一九七四年二月十五日毛泽东在写给叶剑英的信中说：“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当即将此信印发给在京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江青曾为之不满。第二天，二月十六日下午，周恩来在一个场合又明确说：“毛主席讲的‘形而上学猖獗’，是批评江青的。”一个多月后，三月二十日，毛泽东致信江青：“不见还好些。过去多年同你谈的，你有好些不执行，多见何益？有马列书在，有我的书在，你就是不研究。我重病在身，八十一了，也不体谅。你有特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你也是个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的人。请你考虑。”这被看作是对江青的又一次批评。

上面所述情况，正好发生在“黑画展”展出期间，于会泳的请示信是在毛泽东致信江青五天之后写出的。显然，正是江青受到批评的这一背景下，姚文元对“黑画”批判的态度才急转直下，作了偃旗息鼓的批示，而这一处理方式，应该与张春桥、江青的思路相吻合。

摘自李辉《追寻“黑画事件”始末》，原载《书城》杂志 2008 年 8 月号、9 月号。

【文摘】

有笔债……

叶维丽

有笔债在我心中日益沉重，那就是作为“老三届”一代人，我们对文革初期“红卫兵”的暴力行为进行的反思和清算还远远不够，以至于我们的子女对那段不该被遗忘的历史几乎毫不知情。也许这样的集体失忆背后有重要的政治原因，和文革结束后形成的、为了经济发展一切“向前看”（“向钱看”）的国家“历史政策”有关。但对历史终究是无法欠账的，越不勇于正视，就越容易导致对历史

“非黑即白”式的全盘抹杀、全部否定。到头来，恶果还是要自己吃。

值得欣慰的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我们这代人已经开始正视自己文革初期的历史，开始反思，认错，道歉。据我所知，在一些原师大女附中“老三届”同学的聚会上，出现了当年伤害过同学的“老红卫兵”向被伤害同学沉痛道歉的场面。与此同时，文革初期女附中师生代表会的负责人，也在仔细回忆和认真思考女附中文革初期的历史，并问自己：为什么文革中北京市第一起恶性暴力事件会发生在一所有名的女校？我们当年所受的教育出了什么问题？她提出的问题也正是我们在书中间的。这位当年的学生负责人还多次拜访 8 月 5 号被打的五位校领导中唯一的幸存者梅树民老师，倾听梅老师压抑多年的愤懑，反复地、真诚地为当天没有保护好老师们向梅老师道歉。

去年（2007 年）是师大女附中（现名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成立 90 周年。值此大庆之际，以老三届为主的一些校友们提出不该忘却卞仲耘校长文革初期被学生毒打致死的惨剧。为了记住这一女附中历史上的奇耻，更为了警示后人，校友们、特别是众多的老三届学生们，纷纷捐款，为卞校长建立一座雕像，以志永久的纪念。

从 1966 年算起，42 年过去了，卞校长的老伴王先生已是 87 岁高龄，这一天等得太久了。但我们毕竟没有忘记，我们又岂敢遗忘！

几乎每个国家的历史上都有污迹，都有不堪回首之处。近年来，不论是用南非“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方式，还是用加拿大总理（向原住民儿童）道歉的方式，一些国家的政府和民众纷纷直面历史上遗留的问题，寻求真相，并就过去践踏基本人权的行为向受害者或其后代公开表达遗憾和悔恨之意，承诺不容历史悲剧重演的决心。

个人的反省不能代替国家的道歉。我们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国家的行为也不能代替我们每个人的态度。众人拾柴火焰高，民众的推动可以对国家起促进作用。一个有“清洁的精神”的国家，它的良知应该根植在每一个公民的心上。这良知不仅体现在此次四川大地震后举国上下所显示出的仁爱之心，也应体现在一个民族勇于面对自己历史的真相、敢于承担道义的责任。在这个基础上达到的人与人之间的谅解，是一个和谐社会坚实的基石。这，才是一个国家真正的“软实力”。

今天，我们这代人已经鬓发灰白，我们中的大部分人已经退居历史舞台的边角。该是我们静下心来，仔细清洗历史的伤口，认真偿还历史欠账的时候了。于无声处，聚光灯外，我的校友们，我的老三届的朋友们，正在实实在在地这样做。虽然这一切才刚刚开始，但开始了就好。我深受感动。

摘自叶维丽著《动荡的青春：红色大院的女儿们》一书《后语》，该书已由（北京）新华出版社出版。

【小资料】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常委名单

（1968年9月5日成立）

主任——

龙书金，58岁，湖南茶陵人，广州军区副司令员、湖南省军区司令员、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副主任——

王恩茂，55岁，江西永新人，新疆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

赛福鼎·艾则孜，54岁，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委员会主席

郭鹏，58岁，新疆军区副司令员

裴周玉，55岁，新疆军区副政委，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第二政委

李全春，49岁，空军第九军政委

杨立业，32岁，山东泰安人，新疆十月拖拉机厂工人，新疆“三新”派“新工总”（新疆职工总司）负责人，中共党员

胡良才，30岁，河北馆陶人，新疆八一钢铁厂车间党支部书记，钳工，新疆“三促”派乌鲁木齐地区“工促会”（工代会促进会）负责人，中共党员

孜牙，30岁，乌鲁木齐东风人民公社牧民

吴巨轮（文革中一度改名胡乱闯），25岁，山东袁州人，新疆大学数学系学生，

“三新”派“红二司”（红色革命造反司令部）负责人，共青团员
常委——

谭开云，54岁，新疆军区副政委

曹达诺夫·扎依尔，48岁，新疆军区副政委

杜海林，50岁，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副司令员

张英明，50岁，新疆军区后勤部长

李昭明，52岁，伊犁军区副政委

王善良，41岁，空军第八航校副政委

铁木尔·达瓦买提，43岁，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委副主席

王振东，53岁，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副参谋长

何全忠，52岁，原自治区农工部政治部副主任

司马义·艾买提，32岁，原自治区人委文教办公室副主任

蒋慕竹，35岁，原自治区团委副书记

孙世禄，34岁，八一钢铁厂工人

色依提，31岁，新疆第一配件厂工人

玛丽亚汗，女，28岁，新疆七一棉纺织厂工人

戴甲弟，35岁，原自治区交通厅油运司政治指导员

于立友，23岁，乌鲁木齐西郊农场拖拉机手

孔得空，女，41岁，博乐县牧民

吴占魁，25岁，新疆大学学生

杨贵尧，18岁，乌鲁木齐一中学生，红二司代表

骆建新，21岁，乌鲁木齐实验中学学生，三促两红代表

王建中，23岁，新疆八一农学院学生

鲍明海，28岁，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党办秘书

蔡本发，28岁，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通用机械厂代理科长

【简讯】

邱会作将军铜像在家乡揭幕

舒 云

2008年10月21日上午10时，邱会作中将的铜像揭幕典礼在江西省兴国县高兴镇上密村举行，三百多位各地来宾应邀出席。邱会作中将的夫人胡敏和大儿子邱路光、三儿子邱光光、小儿子邱小光、女儿邱小京等从北京赶来参加。邱会作中将的警卫秘书蒋平安、生活秘书汪波也分别从郑州和成都应邀前往。

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高岗的儿子高燕生，黄永胜上将的大儿子黄春光、二儿子项林，陈奇涵上将的儿子陈友西，李天佑上将的三儿子李亚宁，刘震上将的儿子刘卫兵，吴法宪中将的大儿子吴新潮，丁盛少将的儿子丁克西，前中国驻日本大使宋之光的儿子宋扬之等，分别从各地赶来参加邱会作中将的铜像揭幕仪式。李作鹏中将的儿子李冰天因父亲病重，邱会作中将的二儿子邱承光因病，未能前往。

同日凌晨3时，由邱会作的大儿子邱路光主持，举行了邱会作的骨灰安葬仪式，逝世六年多的将军终于入土为安。中华丘（邱）氏宗亲联谊总会的代表在铜像揭幕典礼上致辞：“邱会作中将逝世六年多了，今天是将军魂归故里的特殊日子，中华丘（邱）氏族谱研究总会、世界丘（邱）氏宗亲联合会筹委会和全世界500万宗亲，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参加邱会作将军的铜像揭幕仪式，缅怀将军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邱会作将军的名字，对我们全世界丘（邱）姓来说，都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响亮名字。……他是我们全世界丘（邱）氏宗亲的光荣和骄傲。……将军一生中，经历过许多困难、挫折和委屈，但是将军始终坚持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热爱党，热爱人民，热爱祖国，几十年如一日，公正廉洁，作风正派，积极工作，努力奋斗，把毕生的精力都无私地奉献给了党和军队的建设事业，并为此奋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都曾高度评价说：‘邱会作是历来最好的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提出解放军的后勤工作要‘勤俭办事，勤恳办事，勤巧办事’的三勤方针，至今仍然是军队后勤工作的正确方针，也将是我们丘（邱）姓的治家、创业的法宝。今天，邱会作将军又回到了这片红色的故土。将军为国家、为人民、为国防事业建立的伟大功勋必将永载史册，他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我们与时俱进。”

1914年4月16日，邱会作出身在江西兴国一个贫穷的农家，15岁在家乡参加革命，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经历过长征。建国后官至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1971年邱会作被囚，80年代初被判有期徒刑16年。夫人胡敏原籍陕西，初中毕业，军医出身，红军时期参军。“九一三”事件后，被押到陕西大荔农场劳动改造。邱会作提前保外就医后，被有关方面安置到西安东郊的一间民房里，每月生活费百余元。90年代初，转至西安南郊某干休所，住房面积170平方米。房中除床和桌椅，只有孩子买的一台21寸日立牌彩电。80年代中后期，胡敏恢复师职干部待遇，被安排在总后离休。借家中空房开私人诊所，以微薄收入聊补家用。

邱会作晚年除了每天锻炼和练习书法，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写回忆录。20世纪末邱会作很想回家乡看看，写信询问兴国县委，能不能住在县委招待所。兴国县委请示后回信：兴国是你永远的家乡，家乡会以隆重的礼节欢迎你。可惜邱会作不慎跌断腿骨，未能成行。2000年兴国县委、县政府在城南修建“将军广场”，摆放54位兴国籍将军的半身石雕像，邱会作的半身石雕像安放在广场西北。2001年末，邱会作病重，住进北京协和医院。2002年7月18日，邱会作病逝，享年89岁。

【简讯】

陈英茨遗著《陈永贵本事》正式出版

樵 余

著名记者陈英茨（1924—2002）所著《陈永贵本事》一书，三年前按其遗嘱，自印了少量征求意见本。在经过多方征求意见后，此书的修订本终于由（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正式出版。陈英茨曾于1979—1980年参加中纪委派赴山西的工作组，调查陈永贵问题，对山西的拨乱反正、平反冤狱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了广大干部和群众早日得到平反，他不顾辛劳，东奔西走，因过度劳累而病倒。但即使在住院期间，他每天还要接待十几名上访者。他当年的深入调查和参与处理山西文革中一些大案的经历，为此书的写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005年，李锐为此书的征求意见本撰写了序言，其中说：“陈永贵攀附在‘文革’这根毒藤上，吸吮着它的毒汁与日俱强，与时俱进。由此，研究陈永贵这个人离不开对‘文革’的剖析。所谓‘文革’虽然早已被否定，但这根毒藤滋生的根基和成长的环

境，以及它‘亡也忽焉’的社会成因，特别是铺天盖地形成的千千万万恶果，至今都没得到揭发、梳理和研判，更谈不到追究它的大罪了。”李锐在序中还说：“我今年八十八岁了，沧桑未阅尽，人事却见了不少，但英茨叙述的陈永贵及其事略，仍然使我惊讶不已。”使李锐惊讶不已的陈永贵事略是些什么呢？请看书中的这些标题：“陈永贵是农民吗？”、“大寨的土皇帝”、“骗人的‘自力更生’”、“‘反资本主义’闹剧”、“忘恩负义，恩将仇报”、“非我族类，大加杀伐”、“太行奇冤”、“倚仗权势，包庇罪犯”、“迫害和贬低其他劳模”、“愚蠢的‘西水东调’”……本书出版者介绍：“本书从游民陈永贵、日伪特务陈永贵解放后的步步发达到政治陨落，浓缩了建国后 40 年中国农民、农村、农业的盛衰全景，再现了从农业集体化的突然勃起，到人民公社制度彻底破产的全过程，是研判中国‘三农’问题的教科书之一。对一般读者而言，书中客观描述的诸多台前幕后事，也会引起他们的兴趣。”

【简讯】

中国摄影家李振盛的文革纪实影展 在西班牙维多利亚国际电影节展出

宗 迅

日前，一年一度的西班牙维多利亚国际电影节隆重举行，今年的“主打”展览项目是《罗伯特·卡帕与李振盛纪实摄影联展》。罗伯特·卡帕 1936 年在西班牙战场拍摄《士兵之死》一举成名，1938 年曾与《西行漫记》作者斯诺一同到中国采访，拍摄了许多揭露日本侵略军罪行的照片，他因记录二战而誉满世界，1954 年在越南战场触雷身亡，罗伯特·卡帕被称为 20 世纪最伟大的战地摄影家。

李振盛 1988 年因文革专题组照荣获大奖，受到原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张爱萍将军接见与表彰。2001 年张爱萍又为其摄影集《红色新闻兵》题写“让历史告诉未来”。该书在国际多次获奖并成为美国大学历史专业教科书。这一次，以记录历史著称的两位摄影大师的纪实摄影作品在西班牙联合展出，在国际间引起反响。媒体评论，李振盛与罗伯特·卡帕的作品联展，为中国争得荣耀。李振盛被称为“中国的罗伯特·卡帕”。

维多利亚国际摄影节于 10 月 15、16 日两天里，先后为李振盛和罗伯特·卡帕的影展分别举行新闻发布会。在李振盛文革纪实摄影展召开记者会时，阿拉瓦省文化部长出席并讲话。西班牙的电视、报纸作了大量报道，多家报纸都是以整版篇幅报道李振盛的文革纪实摄影展览。欧美主流媒体驻西班牙记者也到场采访并作了报道。当李振盛抵达当地时曾受到维多利亚市长的亲切会见，他向市长签赠了西班牙文版的《红色新闻兵》画册。

早在五年前的 2003 年 6 月，法国文化部主办题为《李振盛：一位中国摄影家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环球摄影展览在巴黎首展，以国际奥委会前主席萨马兰奇为名誉主席的巴塞罗那 Caixa 基金会派人前往参观考察，决定拨出资金复制一套展品在西班牙展出，自 2004 年至 2006 年间在 6 座城市巡回展览近两年时间，在巴塞罗那展览三个月，观众数超过 10 万人。这次是西班牙第 7 座城市展出李振盛的文革纪实摄影作品，明年将移师首都马德里展览。

李振盛 1940 年生于大连，祖籍山东荣成。1963 年毕业于长春电影学院摄影系，在黑龙江日报社做记者 20 年。文革中，他拍摄了大量的纪实照片，在遭到批斗时，他抢在抄家之前将摄影底片藏在只有一间屋的家中地板下面，使之逃脱被毁的厄运。1982 年他调到中国人民警官大学新闻系执教。1987 年以 20 幅文革专题组照荣获“艰巨历程”全国摄影公开赛的最高奖“系列新闻照片大奖”。1996 年应哈佛大学邀请赴美讲学，近八年来出书办展游走世界，应邀在欧美大学作演讲。由英国菲顿(PHAIDON)出版社以十余种文字出版他的《红色新闻兵》画册，2003 年该书被评为“世界最佳摄影画册”；2004 年荣获美国海外记者俱乐部“最佳摄影报道奖”；2005 年入选自 1855 年以来 150 年“世界 54 位新闻摄影大师”；2006 年入选“影响世界未来 50 华人榜”，牛津大百科出版的《牛津摄影指南》单独列入“Li Zhensheng”词条；2007 年荣获国际“摄影艺术终身成就奖”，获首届“墨子国际摄影大师奖”。《红色新闻兵》被美国大学相关历史专业选作教科书。以李振盛文革纪实照片编辑的《让历史告诉未来》环球影展，五年来已在 30 多个国家/城市展出，欧美观众数已超过 80 万人。

【编读往来】

1、荷兰读者庄菁瑞赐函本刊，对第五期“编读往来”中王里《文革历史研

究存在误区》一文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如下：

从题目上看，存在误区这个提法似乎有些不妥。对文革的研究方式，还原历史的真实性，努力发掘历史事件后面的个人动机，这些方式并没有什么错误。尽管历史不可能百分之百地还原，但文字上做到尽可能客观是没有问题的。如果不重视这个工作，后人看到的这段历史，只能是哈哈镜里的样子。至于发掘个人动机，也没有不妥之处，这是对特定人物的特殊研究方法，是心理学家研究人物的一个很好的课题。至于研究结果是否准确地反映了人物的内心，则是见仁见智的问题。我的看法，即便不能全面地，正确无误地得出结论，至少也能对这类特定人物的了解起到帮助的作用。绝对有存在的必要。

我赞同作者强调的，文革研究不应该忽视：我们每个人当时为什么会有那种疯狂的冲动？这跟我们根深蒂固的思想意识和文化传承有多大的关系？这种疯狂的冲动根源现在是否还残存在我们的血液中？我们用什么办法来彻底克服它？等等问题。对这类问题的研究的确很必要，这说明了对文革的研究需要扩大研究范围，并采用不同的方法、方式，用不同的角度，不应只局限在还原历史的真实性，努力发掘历史事件后面的个人动机这些方面。要全方位地研究，才能对这个中华民族历史上的重大灾难有个清晰的认识。

所以，现行对文革的研究不是存在误区，而是需要开阔眼界，把研究向深度和广度推进。

另，庄菁瑞在另一封信中对文革中的“疯狂的冲动”，谈了她的“一些粗浅看法”：

我们每个人当时为什么会有那种疯狂的冲动？这是人类下意识里面的通病。

冲动的因素人人心里都有，这是生命能量的一种表现形式，没有正确、错误之分。这个世界上绝大部分的人，都不认识自己的内心，更不会努力克服这种心理冲动带来的负面因素。也就是说，不能用理智思考去平衡这样的冲动本能。遇到合适的外界条件，例如文革，第三帝国的纳粹运动等，心里的冲动种子就会骤然爆发，且一发不可收。看看纳粹帝国，为何世上公认的极富有理智思考能力的德国哲学家、律师等高智商人物，也会像白痴一样疯狂地追随元首？再则，群众运动的魅力不可忽视。人类的绝大部分是不善于独立自处的，他们没有人生的方向，喜欢跟在人群中随大流“四处飘荡”，集体的力量让他们感到温暖，感到自信，有可靠感。这个方面可以从红卫兵运动，纳粹冲锋队活动的现象中看到。一位德国的哲学家曾说过：冲锋队的行进声，让他感到振奋，热血沸腾。

至于我们的文革，疯狂参与者不但具备人类通有的下意识，还有我们中华民族特有的传统意识：喜欢造神、拜神等等。这种特有文化不是一言两语，一两个人能够研究透彻的，需要各方面人士的努力才行。

这种疯狂冲动的根源现在依然存在（不是残存）于我们的血液中，如果人类不能清醒地意识到这个问题，文革之类的悲剧还会继续上演。从欧洲的现况来看，由于思想意识，文化背景的改变，像纳粹之类的运动，在看得到的将来都不会再次发生。倒是我们的祖国，至今看不到对文革悲剧的深刻反省，社会中，各种“冲动”的苗头到处出现。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时机合适，新版文革，甚至革命的悲剧就会重演。要避免悲剧的重复发生，唯一的途径是全面深入地反省文革，研究文革。除此之外，没有第二个捷径可走。

2、旅美学人高文谦先生致信本刊编者之一何蜀，对本刊第一期王年一书信中提到的与他的“过节”一事做了说明，希望本刊予以澄清。兹将其信转载如下：

你好！友人近日转来《记忆》第一期纪念王年一先生专刊。读下来，勾起许多对往事的回忆，感慨良多。我与王老素未谋面，但神交已久，因为当时国内研究文革史的人为数不多，圈子很小，彼此知名，视为同道。他早期研究文革的文章，我都拜读过。在海外写《晚年周恩来》时，王老的那本《大动乱的年代》，也是我手中的参考书之一。当时还曾想有朝一日能够当面向王老求教，尤其是看到王老和你合写的给林彪翻案的那篇文章，还专门提到拙作，虽然有过誉之处，内心更萌生了和王老当面探讨的念头。不过，出书后，我被打入另册，有家归不得，错失与王老交换意见的机会。在此，我对党史界老前辈王老的故去，表示由衷的哀悼。

王老在 2003 年 12 月 9 日给你的信中，提到与我“有点过节”，原因是我“告发”了他主编的《文革研究资料》，致使此书不得发行。这种说法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这件事是有的，不过王年一先生把因果关系完全说反了，事情根本不是我“告发”的，而是王老所在单位国防大学向军委请示，把事情捅到了上面，我只是奉命完成上面交办的任务而已。

事情的经过是，王年一先生主编的《文革研究资料》1988 年秋天内部出版后，准备公开发行，报送军委审批，是由国防大学政委张震给杨尚昆写的请示报告。杨尚昆当时是军委常务副主席和中央党史三人领导小组组长（另外两人是胡乔木、薄一波）。杨尚昆与文献研究室主任李琦的关系很熟，对文献研究室很倚重，凡是有关党史方面的事情总是要请文献研究室过目把关。因为当时中央有规定：凡是公开发表中央文件，一律归口由文献研究室负责审查把关。为此，杨尚昆把李琦找去，交代说：军队应起表率作用，不能带头违反中央规定，有什么损

失由军队承担。李琦回来后，作了传达，室里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

当时，我是文献研究室新成立的文革资料编辑小组的负责人，成员有现任文献研究室的正、副主任冷容和陈晋等。之所以成立这样一个小组，主要是因为当时政治环境比较宽松，许多地方纷纷编辑出版有关文革的资料（其中包括王老所在的国防大学）和对文革反思的书籍文章，还有许多涉及中共领袖和文革的影视题材等。中宣部和中办把审稿的任务统统交给文献研究室，实在是不堪其扰。在这种情况下，文献研究室决定与其让别人搞，不如由自己编一套文革研究的权威资料，供党史研究者使用。这便是文革编辑小组成立的缘由。小组成立后，报请胡乔木批准，专门到中央档案馆看文革档案，当时我还雄心勃勃准备一年拿出初稿。

根据杨尚昆的意见，文革编辑小组把国防大学的《文革研究资料》书稿过了一遍，向室里提出了具体的审读意见。由于是杨尚昆亲自交办的事情，李琦不敢怠慢，专门开会研究过。当时文献研究室也是左右为难，因为这既是文献研究室的职责所在，需要向中央复命，同时也不想当恶人，因为听说书已经印制出来，一旦不准出版，损失很大。最后研究的结果，记得是文献研究室副主任金冲及建议给中央的报告中只列举《文革研究资料》一书所编入的中央文件，至于如何处理，由中央决定。报告是由李琦直接写给杨尚昆的。至于后来的结果如何，我就不得而知了。不久，便发生了六四，形势丕变，以往宽松的气氛荡然无存，政治上一片肃杀，我也被撤了职，别说王老编的《文革研究资料》，就连文献研究室的文革编辑小组也未能幸免，准备编辑一套文革资料的计划胎死腹中。

这便是整个事情的经过。既然《记忆》期刊公开了王老的私人信件，我也希望能借贵刊一角澄清事实。这既是对王老生前误会的一个回应，也是对历史负责。

我相信王年一先生如果地下有知，也会愿意看到这个迟到的说明的。文章题目就用“对王老一个迟到的回应”吧。